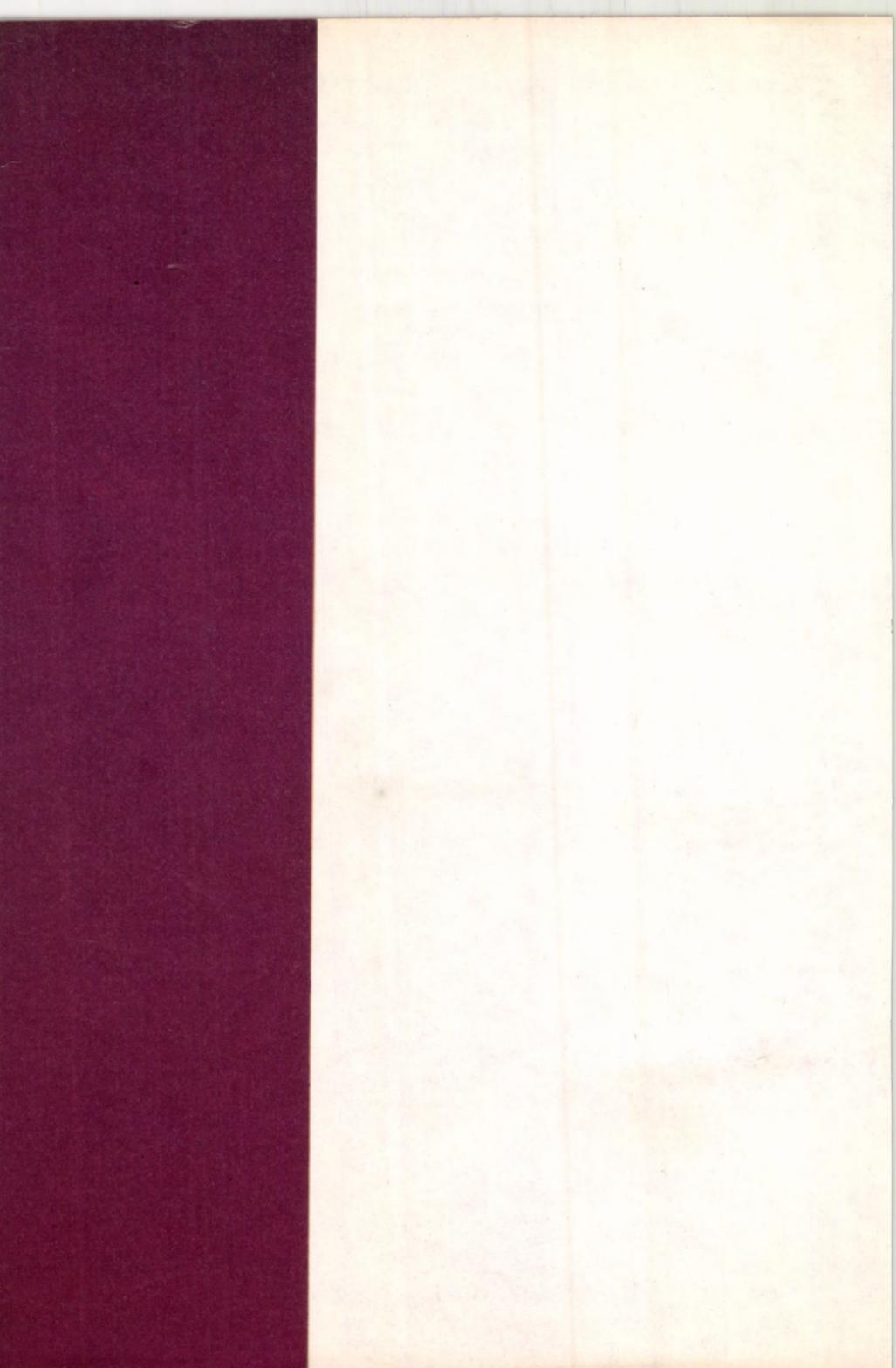


理想与现实

—匈牙利的改革过程

〔匈〕亚诺什·科尔内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To dear Prof. J Kornai

Rong Jingben

1988.8.20

To the Hon. Secy. of State

Prof. J. J. ...

1882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科尔内继《短缺经济学》、《矛盾与困境》等专著之后的又一部力作。科氏在本书中对匈牙利30多年来的改革进行了系统而坦率的分析与评论。科氏描述了1968年改革前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特征和改革给匈牙利经济带来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匈牙利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各种设想与匈牙利的现实进行了对照。读者在读过本书后会注意到：匈牙利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与现象与我国当前改革面临的许多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匈牙利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是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的。本书在论述方面具有与《矛盾与困境》同样的风格：启迪思想，开阔思路，可读性强。

本书可供从事经济、政治、社会的研究人员及实际工作者，高等院校的师生参考。

JÁNOS KORNAI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LV (December 1986)

理 想 与 现 实

——匈牙利的改革过程

[匈] 亚诺什·科尔内著

荣敬本 邱树芳 译
高新军 詹小洪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翠微路22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印张 7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ISBN 7-5017-0041-9/F·135

统一书号：4395·135 定价：1.00元

目 录

译者前言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概念的澄清	5
2.1 经济体制	5
2.2 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	6
2.3 改革	7
第三章 国有部门	8
3.1 指令性计划的废除	8
3.2 双重依赖	11
3.3 软预算约束和弱价格反应	16
3.4 企业规模分布和垄断	19
3.5 小结：从直接行政控制到间接行政控制	20
第四章 非国有部门	23
4.1 题外话：农业改革	23
4.2 非农业合作社	26
4.3 正规的私营部门	28
4.4 非正规的私营部门和第二经济	30
4.5 各种组合形式	34
4.6 小结：积极地面向市场和众多的行政限制	35
第五章 国民经济资源的配置	37
5.1 计划制定	37
5.2 财政体制	38

5.3	货币体系和资金市场	39
5.4	劳动市场	42
5.5	小结：各社会部门既和平共处又相互竞争	43
第六章	紧张与不平衡	45
6.1	传统的短缺经济	45
6.2	短缺的存与亡	48
6.3	通货膨胀	52
6.4	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	54
6.5	个人选择和收入分配	57
第七章	设想与现实的对照	61
7.1	奥斯卡·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	61
7.2	天真的改革家	65
7.3	加尔布雷思社会主义	68
7.4	激进改革者	71
参考文献		75

译者前言

《理想与现实——匈牙利的改革过程》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为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文献》杂志写的一篇专稿，发表在该刊1986年第4期。

在这一长篇论文中，科尔内既作为一名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又作为一名亲身经历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普通公民，对匈牙利30多年来的改革进行了系统而坦率的分析与评论。科尔内描述了1968年改革前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特征和改革给匈牙利经济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匈牙利经济改革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后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各种设想与匈牙利的现实进行了对照。科尔内指出，目前的匈牙利并不象许多西方学者所概括的那样已成为“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而是由直接行政控制变为间接行政控制，市场机制在匈牙利国民经济资源的配置中尚未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匈牙利改革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与我国当前的改革面临的许多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匈牙利利用痛苦和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通过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系统而切实的研究和总结，正在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宝贵财富，当然也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

科尔内写作本文时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为满足我国读者深入研究的需要，我们将参考文献的英文目录附于书末。

由于时间仓促，译文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第七章曾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6期)发表过,在本书出版时,其中某些译文经吴敬琏同志作了校正,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林 林

本书第七章曾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6期)发表过,在本书出版时,其中某些译文经吴敬琏同志作了校正,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第一章 导 言

匈牙利的经济体制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重要的变革，每个匈牙利公民都感到了这场变革的冲击。而且，匈牙利改革实践的影响也远没有局限于这个东欧小国，至少这种相同道路的诱惑力已出现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的领导人仔细地研究了匈牙利的形势，并从中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苏联和其他许多东欧小国中，虽然那里真正的改革尚未开始，但很多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也经常提到匈牙利。毫不夸张地说，匈牙利的改革已具有了某些世界影响。

按照流行的观点，匈牙利经济已经变成或接近于一种“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参照奥斯卡·兰格著名的社会主义模式(1936—1937)，保罗·阿·格雷戈里(Gregory)和罗伯特·斯·斯图亚特(Stuart)认为：“从一般的观点来看，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同兰格模式有惊人的相似性”(1980)。我认为对匈牙利改革的这种概括是不正确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论证我对这种观点的否定看法。本文最后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设想”作出评价，并用匈牙利的现实来与之对照。但是，在将现实同“设想”对照之前，需要进行实证性的描述。我也试图回答下列问题：如果不是“市场社会主义”，那么目前匈牙利体制的真实性质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详细分析匈牙利的情况，以避免过分的简单化。

本文是为了本刊的一般读者，而不仅仅是为了比较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专家们写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包括专家们已经熟悉的情况。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不过也使用了

为了说明问题的数据。这里不是想用计量经济分析来支持有严密逻辑的假设。许多重要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答。论文只显示目前匈牙利和其他国家最近的研究水平。

关于匈牙利改革现在已经出版了几十本书和发表了上百篇文章^{①②}。因此，本文不可能是各篇论文的机械汇集。它说明了一些主要的选择，但归根到底是用我个人的观点对匈牙利的改革进行描述和评价。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说，这是对匈牙利改革的理论背景，它的实际发展的一种“主观”的描述和评价。另外，适当地作些个人的说明。虽然本人的著作在我的祖国有一些理论影响，但是我并不承认自己被公认为改革的“缔造者”之一。我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政府官员，或者任何决策集团中的一员，或者被正式任命的顾问。换句话说，匈牙利改革的伟大成果和缺点都不能算在我的帐上。同时，我过去是，现在仍将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和一个改革过程的批判性的观察者。我希望，这种特殊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我深入地了解事件，同时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作出坦率而公正的评价。

主观的东西并不等于自己的东西。本文包括了我自己著作中的一些思想，但同时也包括了已被承认有贡献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在某些场合，最早的提出者已无法查考，因为有些思想的提出者是匿名的，现在已属于匈牙利经济学界的民间传说。在某些场合，本文反映了匈牙利广大人民相当普遍的舆论观点，

① 本文参考了英文和匈文的著作。文中的匈文著作用字母“H”加以区别。考虑到本刊的大部分读者不能阅读匈文，因此在后面的参考文献中未收入匈文著作和文章。如需要文中参考的匈文著述目录可写信向美《经济文献》杂志或作者索取。

② 这里简单列出一些学者分析和评价匈牙利改革的匈文著述：雷热·涅尔什(Rezső Nyers)，玛顿·塔多斯(Marton Tardos)(1978)，乔瑟夫·伯格纳尔(József Bognár)(1984)，拉热劳·安斯洛(László Antal)(1985a H)。非匈文著述有：理查德·波特斯(Richard Portes)(1977)，贝拉·巴拉沙(Bela Balassa)(1979, 1983)，爱德华·埃·休伊特(Edward A. Hewett)(1981)，保罗·海尔(Paul Hare)，哈格·拉迪斯(Hugo Radice)，奈杰尔·斯温(Nigel Swain)(1981)，保罗·梅尔(Paul Marer)(1986a, b)。我从这些著作中获益匪浅。

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一种普遍接受的“匈牙利观点”。在匈牙利，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并不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同行们少。

考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当读者看完了本文时，他将会对笔者的愿望有清晰的了解。但是，文章只限于实证分析的范围和理论界现在进行的某些讨论；我并不企图提出一种未来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蓝图。

因为本文论述了体制的变化，所以它必然涉及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和政治历史领域中的问题。但是，本文只是经济学家集中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并不是全面分析政治方面的问题的论文。

匈牙利的改革并不是一次突发的行动，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理论的历史开始于G·彼得（György Péter）发表的对旧体制进行深刻批评并提出改革方案的论文（1954aH, bH）^①。实际改革的历史开始于1956—1957年废除农产品的强制收购制度，虽然在1957—1964年期间旧的行政性经济机制仍旧占支配地位。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进行了一整套实质性的改革。后来，改革进一步有所发展。但是，即使在1968年以后，改革的过程并不是沿着单行道前进的。改革推进了，但接着又发生倒退。在60年代末改革的大浪潮以后，1972—1978年代表了反改革势力活跃的时期。1979年又开始了新的改革浪潮，一直持续到今天。除了不断发生的前进和倒退外，赞成改革和反对改革的倾向在任何时候都是同时出现的。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讨论改革演进的历史。本文将集中于分析贯穿于1968—1985年间的普遍现象，并说明目前状况的特点，只是偶而回顾一下历史。

^① 对改革历史，包括对改革理论史的分析，可看伊万·蒂·贝伦德（Iván T. Berend）（1983H），伊万·彼多（Iván Pető）和山道尔·热卡克斯（Sándor Szakacs）（1985H）的著作。拉斯洛·萨缪利（László Szamuely）（1982, 1984）和亚诺什·玛迪尔斯·考瓦克斯（János Mátyás Kovács）（1984H）的著作主要研究改革理论史。

西方读者将会感到，在他们自己的经济中，或者至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政府公有部门和行政部门中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如果对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之间的异同进行讨论，这将肯定是有益的。在西方也有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文献，它们从西方的角度讨论本文在谈到匈牙利时的同样问题。例如，在非社会主义经济中，在税制、价格和工资调节、私有化以及政府和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研究。除了偶尔的提示外，这种对比研究和对有关西方文献的考察，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第二章 概念的澄清

表达我们思想的有一些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在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内涵。我们并不企求对这些概念作出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明确的定义。因此，这部分的目的仅仅是用比较实用的方式去说明本文所使用概念的意义。

2.1 经济体制

我们使用的“经济体制”^①这一概念不仅是指“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属于不同“家庭”的基本制度，而且是指这种家庭内的特殊成员。例如，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们有着不同的体制。

代替对经济体制下抽象的定义，我将经济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概括地列举如下：

经济运行的组织：例如，行政管理机构、非赢利的机构、企业、家庭、联合体；

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分配；

决策权的分配；

信息结构：各种组织之间信息流的类型；

激励决策者的各种刺激；

政治机构和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

法律和政府的决定，即经济运行的正式的法律规定；

^① 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在原文中是一个词。——译者注

非正式的“竞赛规则”：用习惯的行为方式强化、阻碍或补充正式的法律规定。

以上列举是不完全的^①。各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它们不能被任意地挑选。

在匈牙利文献中，“经济机制”或者“制度环境”概念已经多少被当作“经济体制”的同义词。

我们把“政策”概念同“体制”概念作一比较。政策是指政策制定者在既定的体制框架内决策的一定的变量。在这方面，我们遵循了匈牙利讨论的习惯，始终把经济政策问题和经济机制问题加以区别。

2.2 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

体制必须使它的成员即个人和组织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协调起来。为了我们研究的目的，我们把两种纯粹的协调类型加以区分^②。

第一种形式：行政协调^③。这是一种进行协调的个人或组织和被协调的个人或组织之间的纵向关系。控制由多级的行政机构来实施。行政强制和法令强迫个人和组织接受来自上面的指令和禁令。纵向关系延续下来，并加以制度化：它是为“上面”和“下面”所共同承认的。这些行为是非货币化的。但是，如果需要货

^① 比较经济学文献中对“经济体制”这一概念的各种解释大部分都不完全一致。例如参见埃冈·纽伯格 (Egon Neuberger), 威廉·达菲 (William Duffy) (1976) 和约翰·穆·蒙泰斯 (John M. Montias) (1976) 的著作。

^② 更多的分析见科尔内 (Kornai) (1984) 的文章。该文受到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922] (1947), 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1944), 查尔斯·林德布鲁姆 (Charles Lindblom) (1977), 奥利沃·威廉姆逊 (Oliver Williamson) (1975), 乔治·康拉德 (György Konrad) 和伊万·热里尼 (Iván Szelényi) (1979) 等的著述的影响。

^③ “行政”这一术语在东欧的文献中常常用于贬义。本文并不追随这一习惯，按照韦伯的传统，这个术语表示一种价值不占主导地位的特殊的协调形式。

币，那么下级的个体和组织在经济上从属于上级的同类组织。行政机构在资源的分配和收入的再分配中起积极的作用。

第二种形式：市场协调。这是一种买方个人或组织和卖方个人或组织之间的横向关系。双方从法律观点来说是平等的。盈利成为个人和组织的动力。纯粹形式的市场协调是通过买卖双方协议的价格进行的。这些行为是货币化的^①。

有些作者对市场协调有更广的定义，但是，本文将始终使用以上所说的较窄的定义。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在货币、价格和利润发生作用时，才谈得上市场协调。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争论可以翻译成以上分类的语言，即争论的参与者建议采取这两种基本形式的何种结合。现实世界的体制变化可以被描述为这两种基本形式结合的新形式，改变这两者的相对分量，并建立它们之间的新联系。

2.3 改 革

改革是全世界的许多政党和政治运动广泛使用的概念。本文将使用仅供我们讨论用的较狭义的概念。我们所用的改革概念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化，表示减少行政协调的作用，增加市场的作用。

由电子计算机进行的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经济的现代化并不是“改革”。以加强劳动纪律为目标的努力也不能称为“改革”。这类政策措施也许是有用的，但是，它们并不包含体制的变化，不会减少行政管理的作用，提高市场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三个国家正在进行真正的改革。按照改革开始的时间排列，它们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中国。大概接着将写上波兰。

^① 还存在另外一种基本的“纯粹”形式，和这些形式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就本文的题目来说，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就足够了。

第三章 国有部门

我们把经济区分为两大社会部门：用国有资金进行生产的组织即国有部门和经济的其余部门即非国有部门（我们用社会部门来表示具有不同形式的所有制部门）。

必须着重指出，国有部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匈牙利经济的基本部门。如表1所示，官方统计的国民收入总数的大约2/3是由国有企业提供的^①。

3.1 指令性计划的废除

我们首先对改革前用行政办法管理国有部门的“命令经济”作一简短的描述^②。通常的同义词是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古典的社会主义经济、苏联模式的经济、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与改革后的“新”体制相对照的“旧”体制。

国家计划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制定，由最高的政府机构批准。因此，计划带有严格的指令性。经济由按等级制组织的各级行政机构来管理^③。最高层决定的计划指标是自上而下逐级下达的。

① 官方统计中未包括的产出部分将在后面予以讨论。

② 更详细地描述这种状况的有下述作者的英文著述：大卫·格兰尼克（David Granick）（1954），科尔内[1957]（1959）、尤素夫·伯林纳（Joseph Berliner）（1957），巴拉沙（Balassa）（1959），弗·布鲁斯（Włodzimierz Brus）[1961]（1972），阿列克·诺夫（Alec Nove）（1978·1983），莫雷斯·伯恩斯坦（Morris Bornstein）（1981），格雷戈里（Gregory）和斯图亚特（Stuart）（1981）等。

③ 本文没有专门讨论党的作用问题。党组织并不象非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是单纯的政治团体，而是负责处理各种事务的机构。尽管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党和政府是完全应该分开的，但实际上，它们分不开，共同参加了所有有关的决策过程。在联合行动中，党具有领导作用。因此，本文所说的“行政机构”或者“行政控制”概念也包括了党的机构的作用在内。

表 1 社会各部门在全部就业和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靠劳动挣得收入者人口分布				国民收入的分布		
	1966	1975	1980	1984	1975	1980	1984
1. 国有部门	65.0	70.9	71.1	69.9	73.3	69.8	65.2
2. 非国有部门							
(1) 合作社	30.7	24.9	25.5	25.9	17.8	19.8	20.6
(2) 家庭农业	—	—	—	—	4.0	3.2	2.8
(3) 辅助生产	—	—	—	—	3.0	3.7	5.9
(4) 正规私营部门	4.3	4.2	3.4	4.2	1.9	3.5	5.5

资料来源：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报告。按照我们的分类，无法获得1966年时各部门对国民收入贡献的资料。

注：非国有部门我们将在第四章中予以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核算体系即“实物产值体系”(MPS)中，“国民收入”指的是净产值。表中除了家庭农业和辅助生产之外的其他部门都不包括非正规私营部门在内。

因此，基层国有企业每年要接到成百上千个指令性计划指标。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一系列的产出指标。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实物量来表示，也可以用某年的固定价格计算的总产值来表示。生产多种产品的企业则有其生产的各种产品的产量指标。第二，投入定额。同样，有的以实物量来表示，有的以实际价值来表示。这里包括由中央分配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份额，它不仅指数量和质量，而且指定了供应者。这里还包括劳动定额和工资基金。第三，关于生产成本、利润、信贷的最高限度的指令性财政指标。第四，规定企业的某些活动：采用新技术或生产新产品、确定新的投资项目等等。尽管所有的计划指示都是强制性的，但某些“重点指标”制定得更严格。例如，至少是总产值指标、工资支出的某些限额、有时某些特定的出口指标，就规定得特别严格。

信息流并不是单向的。企业可以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提出建议，还可以在执行计划期间和完成计划之后报告执行结果。但是，更重要的信息流是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即上级给下级发出的指

令。

指令性体制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刚性。命令一旦下达，就很难改变。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不同部门和一级一级的批准过程。当然，详细的计划指标体系是相互依赖的；它是一种关于未来经济过程“一般均衡”的前景。这就说明，任何重大变化所形成的缺口，都将对所有其它部分产生影响，并要求对计划作适当的调整。但是，计划制定者完全懂得，他并不喜欢这种多余的工作。其结果就是对供求和技术的突然变化的反应非常缓慢，而又很不完善。

最高的计划者试图保证“紧张的计划”（Holland Hunter 1961）。计划必须具有一种“动员”的作用，能够从既定的资源中得到最大的产出。这是造成计划刚性的又一原因（因为已经没有易于支配的供迅速调整用的资源）。此外，计划导致了在次要部分上，采用防御性的做法。企业经理的利益促使他隐藏企业的真正能力，得到一个宽松的计画，以便在供给品没有按期到达时也能轻松地完成任务。当然，上级机关对企业的状况很了解。于是，对计划进行讨价还价，上级计划者想用较小的投入换取较大的产出，而下级的想法正好相反。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经理的动力是完成计划，或许还有一点超额，但是这不能做得过头。因为今年超额完成的部分将并入下一年的指令性指标。结果是生产受到了限制^①。

投入和产出的组合被扭曲了。扭曲的方向取决于“优先”指标的质。例如，总产值指标规定得特别严格，那么经理的利益就在于用大量昂贵的材料来生产产品。如果产量指标是吨，或在纺织工业中是米，那么经理的利益就在于生产重型产品或细布。

^① 东欧自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这种现象被称为“基年法”。西方文献中引入了一个恰当的名称“棘轮原理”〔见伯林纳(Berliner)(1957), M·克伦(Michael Keren)(1972), M·克伦、J·米勒(Jeffrey Miller)和J·R·桑顿(James R. Thornton)(1983)〕。

产出计划在任何价格情况下都必须完成，从而忽视了所有其它“不重要”的指标和行政部门很难检查的指标，如提高产品质量，引进新产品，降低成本，经常维修机器和厂房等。

在国有部门中，命令经济运行的抽象模式是官僚机构按照严格的纪律一丝不苟地执行的严格的纵向行政控制。现实的命令经济并不象模式那么“纯”，一些横向协调也是存在的。这种协调部分地是建立在非金钱的基础上的：生产者企业和使用者企业之间建立了互相帮助的非正式协议，有时为了得到更加可靠的供货，也用货币对供应者进行一些刺激（这是半容许、半禁止的“市场”关系）。总之，50年代初匈牙利的国有部门的体制是相当接近于纯命令体制模式的。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产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例如，产生了一些有限制的职工利润分成形式。60年代中期，改革的讨论又重新活跃起来，当时讨论的问题是国家在废除指令方面应该走多远。后来，领导采纳了激进的解决方案。经过仔细地准备后，从1968年1月1日起一下子全部废除了整个短期命令体制。国有企业正式地被宣布为拥有短期产出和投入的自主权。

在东欧，正统的经济学家曾经担心，没有了指令性计划，社会主义体制将要瓦解。事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本文将对匈牙利改革提出许多批评意见，但是，这决不是低估匈牙利经济体制变化中一个最突出和无可争辩的结论：即使在没有充分发达的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一下子废除短期指令计划也是可行的。

3.2 双重依赖

什么将取代命令体制呢？改革后的匈牙利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是在“双重依赖”的条件下活动的。它既纵向地依赖于行政机构，又横向地依赖于它的生产资料供给者和它的产品消费者。只要简单地考察一下国有企业的活动就可以描绘出这种双重依赖的体制

是如何运行的了。

开业 创建国有企业是繁琐的行政过程的结果。它可以由某个人或者集体倡议，但是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政府机关的积极支持。

目前，建立小型国营企业的法律条件已经放松了。现有企业可以建立附属企业，它半从属于半独立于创办者。作为国有企业潜在的竞争对手的非国有部门的生产者也有办企业的可能性，但是这仍旧受到了某些限制。

停业 停产的国营企业是存在的，但是它们的数量相当小，而且它的停业（包括最后的财产清算和为另一个国有企业所合并）要由行政程序来决定。“破产”并不是市场上自然选择过程的直接结果。在停业和长期亏损或无法偿还债务之间并没有直接肯定的联系^①。

高级经理的选择和任命 这方面还保留着大部分重要的纵向联系。除80年代中期有某些变化外，企业领导成员一直是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的。一个成功的经理的晋升既可以是在本企业内得到提拔，也可以是调到另一个企业或国家机关。同样，一个行政部门的官员也可以被任命为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对于经理来说，这里不存在真正的“职业市场”；他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上级行政机构的看法。因此，不难理解，经理们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取悦于他们的上级。

1985年，作出了新的规定。多数国营企业的高层领导不再由

^① 这一结论以及本文所提到的其他一些结论主要根据一项考察1975—1982年间匈牙利全部国有企业财务平衡表的大规模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由作者和A·玛递茨 (Agnes Martits) 领导。研究结果在科尔内和玛递茨 (1983H, 1984), 玛递茨 (1984aH, bH, cH) 和爱娃·瓦海吉 (Eva Varhegyi) (1986H) 等文章中讨论。也可看M·拉齐 (Mihály Laki) (1982, 1984), G·兰伯格 (Galina Lamberger), G·玛托劳西 (György Matolasy), E·热依衣 (Erzsébet Szalai), 爱娃·沃斯卡 (Eva Voszka) (1986H), G·帕普尼克 (Gábor Papanek), 彼得·萨康尼 (Péter Sárkány) 和E·魏斯特 (Erzsébet Viszt) (1986H) 等人的文章。

上级行政部门任命，而是由企业的工作人员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行政部门和政治机构则对选举前的候选人和选举的结果有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否决权。由于改革实行的时间还不长，无法对这种做法作出评价。

产出的决定 在这方面，企业的自主权有了很大的发展。短期年度计划由企业决定。上级行政部门并不下达产出指标。这是一项重要的改变。但是，仍旧提出了非正式的“要求”，告诉企业对经理的“希望”是什么。典型的是，要求企业出口某些产品，向上级官员的关系户供应某些产品，或者消除一定时期内紧迫的短缺。在所有这些场合，企业经理们一般都是愿意照办的。

投入的决定 无所不包的物质分配体制已经废除，但某些产品仍由中央集中分配，仍旧存在着非正式的配额、许可证、或者其它限制。

国营企业作为卖方和买方之间的横向联系无疑已比改革前加强了。这种联系是按照价格、质量标准和交货日期达成的真正的市场合同和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君子协定”的混合物。但是，这种横向联系仍然不能摆脱纵向调节的决定性影响。在发生意见分歧和违反协议的情况下，就向行政机构提出申诉，请求它进行裁决和干预。

技术的选择 虽然曾有过行政机构的干预，但并不普遍。在这方面，企业的自主权真正地扩大了。

价格的决定 改革之前，国有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价格几乎都由行政机构任意地决定。相对价格总的来说被扭曲了。在改革过程中，规则变化了好几次。一些价格仍旧由行政部门决定，尽管通常受企业的影响，在个别场合遇到企业的巨大压力。1968年以后，至少在名义上，大部分价格已不再是行政价格，但是，其中多数价格仍然没有变为真正的自由市场价格。行政性的价格控制用多种方式对价格的形成发生强大的，有时候是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严格规定了对许多产品计算价格的方法，规定了必须执行的“成本附加”的原则，作出了如何计算成本和所允许的边际利润的严格指令。在其它场合，采用所谓竞争价格的原则是指令性的。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的边际利润不得超过在国际市场上达到的边际利润。同样，内销和出口商品之间的价格提高必须保持一致。已经公布的计算原则又有许多例外，这些例外又是由行政规定的很长的程序来决定的。

其次，许多名义上由企业决定的价格变化必须事先向物价管理部门报告，行政部门可以干预，也可以不干预；可以正式地干预，也可以非正式地干预。

再次，存在着反对“不公平利润”和“不公平价格”的法律。当然，“不公正”是模糊概念，必然依赖于解释和主观的判断。由于企业经常地受到检查，它们总是担心它们的定价活动可能受到指责。

遗憾的是，在如何把目前匈牙利的相对价格体系同合理的价格体系相比较，或多或少正确地反应相对稀缺方面，并不存在有效的能给予明确评价的研究。一些作者指出，价格已比改革前更加接近于合理的比例，这主要因为主要的原材料、能源和许多外贸商品接近于世界市场的相对价格（贝拉·奇科斯-纳吉（Béla Csikos-Nagy）1985 H）。包括作者在内的其他人接受了这些结论，但是坚持认为，由于上面所提到的普遍的和行政的干预，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仍旧占上风。在相互依赖的价格体系中，任何一点随意性都会导致进一步的扭曲。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随意增减税收的税制必然导致价格的扭曲。拉热劳·哈尔贝（László Halpern）和乔治·穆纳尔（György Molnár）（1985）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批评者观点的间接证明。他们借助于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以统一的利润率为基础的“成本附加”的影子价格体系。计算显示出影子价格对实际价格比率的惊人的广泛离散现象。

随着改革的进行，价格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已经加强，但仍旧

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个问题。即使企业全力注视着价格，但价格可能仍旧发出错误的信号。

工资和职工定额 重要的变化是完全废除了改革前最强有力的计划指令之一的工资总额的绝对最高限额。但是，仍旧存在着一些干预工资形成的行政手段。自从改革过程开始以来，这些手段已经变化了好多次。例如，企业的累进税同平均工资相联系，或者同工资成本相联系，或者同工资增长额相联系；工资的政策指导是同贯彻这些政策的强大压力联系在一起的。

改革的成果是废除了指令性的职工定额，但是，在70年代，对劳动日益短缺作出反应，雇用劳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限制又重新出现了。

信贷 匈牙利具有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存在着对信贷的持久的过度需求。银行部门（除了后面将讨论的新机构外）是信贷分配的行政机构，而不是遵循商业原则的真正的银行（György Tallós 1976 H）。它同国有企业的计划者和其它权力机构的监督有密切的联系。同意或不同意贷款几乎不同企业的过去或者现在的盈利情况和偿还能力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存在相反的联系。信贷体制经常用于填补企业在市场上的亏损。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最近金融部门的改革，大约会出现更多的市场导向的实践。5.3节中我们将回头讨论这个问题。

税收和补贴 改革前，企业除了很少的利润留成外，必须把所有毛利上缴中央财政。实行把税后利润留给企业的税收制度，这是一项重要的变化。然而税制极其复杂，国有企业的各种税收和补贴总数达290到300种之多（Vilmos Falubiró 1983 H）。其中很少是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的。许多税收和补贴的规定看起来是普遍使用的，但是，深入考察就显示出，它们是为少数企业特别规定的，在许多场合，只适用于1 600—1 700个企业中的几十个企业。这是“量体裁衣式”的规定。此外，允许特定税目的免征，推迟纳税期限，以帮助企业克服财政困难。有些企业则苦

于税制的不可预见性。中央当局总觉得企业“钱太多”，因此税率可以随意地提高，或者采用新税种，或者强制企业储蓄（例如，规定强制性的存款或后备基金）。

对全部国有企业的整个补贴总额大约等于纳税前的利润总额；税收总额甚至大于毛利总额，因为国有部门是纯纳税人。这意味着毛利都变成了税，通过上百种渠道把货币拿走了。

投资 改革前，投资决策权和财力都高度集中于中央。改革的成果是企业的自由支配权扩大了；企业可以留相当一部分利润用于投资。然而中央权力仍旧非常强大。对于大多数投资项目来说，企业需要从银行或者政府预算中追加资本。国营部门投资只有很小部分，大约投资总数的1/5，是真正由企业一级决定的，由企业自己的储蓄支付。除此以外，企业必须与给予外部援助的机构达成协议。这样，行政机构就能对投资的分配起决定性的影响(瓦海吉(Várhegyi)1986 H)。干预的另一种形式是冻结企业原来为投资而储蓄的存款。

中央对投资的分配不是以赢利的尺度为指导的。几乎可以说，情况正好相反。政府向创造大量利润的企业征税，通过再分配，帮助亏损企业。作者和玛递茨(Matits)(1983 H, 1984), 玛递茨(1985 H), 瓦海吉(1986 H)等对企业财务数据的深入研究表明，某一年的税前或者税后的盈利和下一年的投资活动之间没有实际联系。反过来说，这一年的投资活动和下一年的税前或者税后的盈利之间也没有实际联系。因此，无法预期将来的赢利率，因为期望的和现实的赢利率之间没有实际的联系。最近情况已有所好转。建立了新的金融工具，并允许采用新的集资方法。

3.3 软预算约束和弱价格反应

正式文件宣布，盈利是评价企业工作的主要标准。经理的奖金同利润挂钩，职工也可以分红^①。采取这些措施，是希望把企业

变为利润最大化的真正谋取者。但事实并非如此。表 2 说明了这种情况。

表 2 1982年制造业部门的国营企业因财政再分配而造成的盈利率转移情况

从原始盈利率	到 最 终 盈 利 率			
	亏损企业	低水平盈利率企业	中等水平盈利率企业	高水平盈利率企业
亏损企业	0.233	0.500	0.122	0.145
低水平盈利率企业	0.38	0.853	0.103	0.006
中等水平盈利率企业	0.000	0.734	0.206	0.060
高水平盈利率企业	0.008	0.394	0.515	0.083

资料来源和详细分析见玛递茨 (1984 aH 第48页)。

注：关于本表的研究背景参见12页注①。“转移”的意思是指，作为财政再分配的结果，在原来原始盈利率组的企业变为最终盈利率组的企业。从“原始”盈利率到“最终”盈利率的转移意味着从征税或补贴前的状况转变到征税或补贴后的状况。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亏损企业。亏损，即使持续很长时间，也能用不同方式得到补偿：特殊的或者持久的补贴；特殊的或者长期的优惠纳税条件；无担保的贷款。物价局可以容许提高行政性的价格或者偏离某种行政规定的定价准则。我曾创造了“软预算约束”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 (1979, 1980, 1986)。国营企业的财政地位不是不受影响的。虽然“存在”预算约束，企业要执行某些财政纪律，但是这种约束并不严格，根据上级的意志可以有“弹性”。从原则上讲，企业应当从市场上创造的收入来弥补支出。但实际上，从市场上取得的收入可以任意地用外部的帮助来补充。

① 作两点评论：第一，经理的奖励与税后盈利率挂钩，为经理提供了少交税收和多要补贴的额外动力。第二，利润分红也拉平了。与盈利率的很大差异相比，每个工人分得的利润与工资之间的比例差别甚小 (见科尔内和玛递茨 1983 H, 1984)。

关键是长期亏损的企业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将清楚地表明：利润究竟是“生命攸关”的，还是虚幻的东西。国家行政机构对国营企业显示出慈父般的关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是国家创办的，创办者不能让它们倒闭。维持亏损企业，可以提出许多理由，例如，要保证职工就业(格兰尼克(Granick)1984)，或者实行进口替代等等。这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的压力。但是，许多观察者提出了下列问题：如果企业遇到了很严重的财务困难，由于社会政治原因，它不能倒闭，那么至少为什么不能把经理撤职呢？采用这种严厉的措施将提高利润动力的影响。但事实上，经理们既可以呆下去，又可以被调任到另一个工作岗位上去，而他个人在收入和威信上不会有任何损失。原因是简单的。因为有成千上万的行政干预，所以经理们并不能对其行动负全部责任。在经营失败时，他可以争辩，而且不无理由，因为他只是在同上级商量后才做出所有重大决策的。况且，许多问题是中央干预、随意定价等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构当然感到有责任去保护那些亏损企业了。

另一方面有创造大量利润的企业。但是，表2说明存在一种减少巨额利润的平均主义倾向。预算约束不仅是软的，而且捉摸不定。因为财政规定、税收和补贴往往突然改变，企业感觉无保障，听任行政机构随意干预(Károly A. Soós 1984)。

尽管使用的术语不同，但实际上大多数匈牙利经济学家都同意：财政纪律是不严肃的，不存在强大的市场强制力迫使企业追求利润。这种“软预算约束”综合症具有许多消极的后果。我们只指出一点，即对价格的反应很弱，尤其是在投入方面。如果对相对价格的错误判断不能通过运行良好的市场选择过程自动加以惩罚，那么，企业就不会有作出迅速彻底调整的强大刺激力。虽然有一些研究企业对相对价格反应无力的文章，遗憾的是并不多见。例如，朱蒂·萨博(Judit Szabó)和伊姆雷·塔拉法斯(Imre Tarafás)(1985)用多重回归分析证明，汇率的变化对

生产者产出，特别是投入的选择的影响是很微弱的。

我们正面临着相对价格体系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同软预算约束综合症之间的恶性循环，哈尔贝 (Halpern) 和穆纳尔 (Molnár) (1985)，安塔尔 (Antal) (1985 aH)，科尔内和玛递茨 (1984) 等持有这种看法。因为价格是随意的和被扭曲的，所以企业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补贴。允许外部援助，又使错误价格得以保留。

3.4 企业规模分布和垄断

如表 3 所示，匈牙利生产企业的规模分布朝有利于大企业的方向严重倾斜，这种情况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Iván Schweitzer 1982H, Gábor Révész 1979, Eva Ehrlich 1985 a, bH)。1975 年，匈牙利工业中的三个最大的生产厂提供了 637 种产品中的 508 种产品总量的 2/3 以上 (Zoltán Román 1985)。^① 极端的高度集中削弱或者消除了潜在的竞争，并在许多生产部门中产生了垄断和寡头。

表 3 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分布

	匈牙利	若干资本主义国家
每个企业平均职工人数	186 人	80 人
职工人数规模分布的百分比：		
10—100 人	14	35
101—500 人	26	33
501—1000 人	19	13
1000 人以上	41	19

资料来源和详细分析见恩里奇 (Ehrlich) (1985 b) 第 92 页。

注：这里的数字是 70 年代各年度的平均数。右边一列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

^① 637 种产品的产值占了全部制造业产值近 75%。

有相当多的组织具有“国营企业”的法人身份，但是实际上在起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目前它们的数量比改革前少了，但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它们有权力决定它们提供给消费者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分配。例如，提供汽车的垄断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一家唯一拥有提供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权的垄断银行。

在最近几年，经过艰苦的努力打破了垄断地位，把大的实体分解为几个较小的单位。规模分布已经变得不那么极端，发生了向小单位的转变。然而，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并且遇到了强大的反抗。

国营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待遇差别很大。一方面，大企业在争取优待，特别是获得投资资源方面非常成功。虽然其中一些企业处于严重的财务困难，但得到了大量的贷款和补贴 (Mária Csanádi 1979H, 1980H, 1983H, Erzsébet Szalai 1982, (Matis) 1984cH)。而小企业不在上级的眼中。但它们很少受到经常的检查，因此比大企业更容易逃避一些僵硬的规定。

3.5 小结：从直接行政控制到间接行政控制

经过改革，匈牙利国营部门的状况已得到改善。现在企业有更多的机动余地；它们已经变得不那么僵硬，而具有更多的适应性。它们用更灵活的方法反应需求的变化，并更多地注意质量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如果人们把匈牙利同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一比较的话，那么这些成绩变得更明显。

尽管有这种评价，然而改革仅仅走了一半。匈牙利国有企业并没有在市场社会主义框架内运行。改革了的体制是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的特殊结合，即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的结合。当然，可以说，任何现代的经济都是如此。资本主义经济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行政干预而单靠市场进行的。问题的实质是混合的组成部分的相对强度。虽然我们没有精确的标准，我们的阐述也不是

很明确的，但是我们敢于提出如下的假设：行政机构对市场过程干预的频率和强度具有一定的临界值。如果超过这些临界值，那么市场就会被行政规定所削弱和支配。这就是匈牙利国有部门的情况^①。市场并没有死亡。市场完成了一些协调的工作，但市场的影响很弱。企业的经理用一只眼睛注视着消费者和供给者，用另一只眼睛注视着行政上级。实践教会他睁大后一只眼睛是非常重要的：经理的提升，企业的存亡。税收，补贴和信贷，价格和工资，影响企业繁荣的所有财务“规定”，都更多地依赖于上级行政机构而不是市场实绩。

在改革的过程中，行政机构本身已经变化了：它已经变得不那么严格地集中了。它往往是用多变的方式进行活动的多层次的行政机构的特殊混合物，比改革前有更多的中心。每一个部门的领导者有他自己的重点，运用他自己的干预手段，同意给予一些企业优惠，把额外负担放在其它企业身上。这种独立的控制的线路越多，它们就越会削弱各自的影响。

“竞赛规则”不是自然地靠经济和社会过程的有机方法产生的，相反，它们是人为地靠政府官员和行政机构的委员会建立的。当然，它们是不完备的：它们没有产生真正期望的结果，因此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修订。而且，它们不能为企业的行为提供稳定的指南。一旦企业的反应变得明显了，规则又得重新修订。

国家的作用不限于决定或者影响一些重要的宏观总量或者诸如汇率或者利率这样的大的经济参数。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存在着无数的微观干预：行政机构的微观规定继续占有上风。

^① 彼特斯(Portes)很早以前就提出了同样的看法(1972年第657页)。他写道：“分权必须超过一定的限度才能站稳脚跟”。但是他非常肯定地认为匈牙利的“战略和策略已使改革超越了这一界限。”许多外部观察家也持有这种看法。但是本文表达的观点与之不同：匈牙利改革并没有越过使一种真正的市场经济(伴随有某种程度的行政干预)与主要是由行政控制的经济(有某些市场协调的因素)分离开来的临界点。

企业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上级部门的每一个新政策就会引起一种新对策。首先，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社会，主要方向是纵向的，即在上下级之间或者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讨价还价，而没有横向的、卖方和买方之间的讨价还价。以上提到的所有问题——创建、停业、任命、产出、投入、价格、工资、税收、补贴、信贷和投资——都是详细的谈判对象，争取、游说、公开的或者隐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施加影响。匈牙利的文献称这种现象为“调节指标的讨价还价”；它取代了过去命令经济中流行的“计划的讨价还价”。甚至在古典的命令体制中，企业也有一点讨价还价的力量。在新的体制中，它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实际上增强了，特别是大企业更是如此。

如果讨价还价没有成功，企业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不用明显的非法手段，而用一些计谋来逃避调节，表面上遵守法律的条款，但是却违背了法律的宗旨。然而，当法律制定者认识到存在着漏洞时，他就要制定新的法律，更完备的法律，于是这种竞赛又重新开始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了以后引用，我们需要给在匈牙利国有部门中已经产生的体制起一个简短的名字。我们建议称它为“间接行政控制”，把它同“直接行政控制”的旧命令体制并列在一起。这个名字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协调中的支配形式仍是行政的控制，而不在于一整套的控制手段已经发生了有意义的改变。

第四章 非国有部门

4.1 题外话：农业改革

本节将进一步广泛考察以不同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各社会部门。在这一节里，我们离开主题研究农业部门的各种所有制形式。这个部门也许是改革最成功的部门。因此，把农业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是有益的。(Ferenc Donáth 1980, Swain 1981, Csaba Csáki 1983, Michael Marrese 1983, Alodár Sipos 1983)。

在最近25~30年内，对立的趋向发展了。国营农场的比重相当稳定。但“农业集体化”，即强制组成的农业合作社，却有两次大浪潮：第一次是在50年代初期，第二次是1959—1961年间。在第二次浪潮中，把三分之二以上的耕地从私有变为合作社所有。许多农业合作社只允许保留小块私有土地和少量私有牲畜。目前各种类型所有制形式所占的比重如表4所示。尽管发生了朝集体所有制方面的巨大变化，但是，匈牙利农业与标准的集体化农业生产组织仍不尽相同。

表4 农业总产值中各社会部门所占比重(%)

	1966	1975	1980	1984
国营农场	16.4	18.0	16.8	15.3
合作社	48.4	50.5	50.4	51.1
家庭农业	23.7	19.0	18.5	18.4
辅助生产和私营农场	11.5	12.5	14.3	15.2

资料来源：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报告。

合作社 这是在农业中存在的最大的社会部门。它们的功能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在改革前的体制中，合作社的情况和国营农场的情况差不多。它是紧紧地套在命令经济的框架中的；它象国有农场一样接受详细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改革的结果是这种指令性计划体制已于1966年被取消，正象两年以后国有部门所做的那样。不过，经常性的非正式行政干预仍然存在。

就是在原来的体制中，合作社的领导也是由选择产生而非指定的；这是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之间基本的法律区别。然而，事实上，选择是被操纵的，只是使预定的管理人员经全体社员形式上同意而已。虽然现在社员更积极地参加选举和任命管理人员，然而，这种惯例到现在还没有根除。全体社员名义上的份量比它的实际份量要重得多。

50年代初期的合作社，物质刺激的作用很弱。以极低的行政性价格征购的部分占了农产品的绝大部分。换句话说，农民挑起了沉重的税收负担。在欠收的年份里，农民甚至难以留下来年的种子和他们自己的口粮。那些年代有个形象的比喻：农民家的阁楼都被征购打扫得干干净净。法律许可农民在市场上出售余粮，但是他们极少、或者干脆没有余粮可售。

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在产出和投入两方面，有些（虽不是全部）价格的扭曲已经消除。物质刺激增强了。如前所述，这种征购体制早在1956—1957年就废除了。合作社可以按照合同向国家贸易组织出售，但是，如果它们愿意，允许它们自销。作为整体，合作社以赚取更多的收入和更大的利润为动力。合作社在决定使用属于它们自己的盈利上有更大的自主权。许多地区，在合作社内部实行一种特殊的分权制：作业组或者个人负责某一生产线，从这个生产线的纯收入中取得他们自己的份额。

改革前，农业合作社除了从事农业活动外，其它任何活动都是被禁止的。在改革过程中，非农业活动已经发展。合作社从事食品加工、为国有工业进行部分生产、从事轻工业、建筑业、贸

易和经营餐馆。1984年，非农业生产的份额占农业合作社总产出的34%。采用这种方法，利润增加了，也能够充分利用季节性的劳动闲置时间（Kálmán Rupp 1983）。

合作社社员的私人家庭农场 有人在此发现了最引人注目的变化。由于对自留地规模的法律限制仍无变化，因而大多数家庭都在这种特殊形式的私有农业中劳动。关于自留畜和拥有机器的限制已经取消了。家庭农场生产了大量的食肉，奶制品及其他动物产品、水果、蔬菜。除了少数例外，在出售产品方面没有法律限制，价格是由食品自由市场的供需决定的，因此，农民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辛勤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合作社和农业行政管理机构对家庭农场的态度与过去大不相同。在旧体制中，合作社是不友好的；私人家庭农场被当作即将由集体生产形式取代的“资产阶级残余”。现在，私人家庭农场被宣布为永久性的社会主义农业成分。合作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提供帮助：它们供给种子、帮助运输、借给机器、提供专家咨询以及帮助出售产品。合作社和私人家庭农场的任务已有明显划分，由于小规模生产收益更大，所以私人家庭农场把精力集中到精细生产上；而合作社则把注意力集中到粮食和饲料生产上来，因为可以通过大规模操作进行最高效率的生产。

我们并不想画一幅理想主义的图画：事实上，在这个领域内也存在着许多麻烦。例如，有定期的反复无常的政府行政命令干预家庭农场生产，使农民感到不安，削弱他们的信心，国家贸易组织是许多农产品的主要购买者，它给私人生产者出的价格有很大的扭曲。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家庭农场仍是比较成功的。

辅助性的农业生产 匈牙利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农业传统的国家。在非农业行业中工作的人们也喜爱拥有一座花园或一小块土地，种一些水果或蔬菜，饲养家禽或猪。放宽官方限制的措施进一步刺激了农业经济活力。辅助性的农业生产变成了总产出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它不仅包含了从事经营的家庭自己消费的必要

部分，减少了对市场产品的需求，而且也丰富市场供应作出了贡献。其中有些生产单位发展为专业化的、拥有大量资本的私有农场，几乎专门为市场生产农产品。

国有农场 在农业总产出中，国有农场的份额并没有多少变化，但其地位却不如以前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完全符合国有农场的情况。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它的双重依赖，但是同国有企业的其它部门相比，市场的作用相对增强了，而国家行政协调的相对作用减弱了。价格更加合理，管理人员更加“企业家化”，利润动机更加强烈。这种变化被解释为在农业部门中，少数的国有企业被大量的合作社和私人家庭农场所包围，而后者正是以勇猛竞争并明确以市场和利润为主要目标的。因而，占少数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农业部门占绝大多数的行为。

总之，匈牙利农业揭示出的是巨大成功与尚未解决的问题两者的特殊结合。主要功绩在于有效地改进了国内食品供应，某些商品已能提供出口，在所有的基层部门中激起更高的工作积极性。但所有这些成果都是以很高的代价取得的：要借助于非常巨大的资本投资和农民艰辛的“自我剥削”。

现行的规模分布并不令人满意。在家庭农场中，中等规模的单位，即小于大规模的国有的和集体的单位，大于“微型”规模的单位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拥有发达农业的其他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是：只有少量人劳动而拥有很高的资本密集程度。象这种高效率、高生产率的形式在匈牙利的合作社或私人农场中迄今仍无发展。因其已被现存的大规模单位的特权和保守的行政干预抑制了。

4.2 非农业合作社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逐一研究各个社会部门。下面先谈谈合

合作社。因为在前一部分我们只研究了农业合作社，在此我们集中研究一下非农业合作社。在制造业、建筑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改革中，非农业合作社的作用明显加强。它们在许多方面与农业合作社相同，在此不再重复^①。需要提一个重要的区别：就信贷、纳税、补贴、进口而言，非农业合作社的有利待遇比农业合作社要少。

国有企业与合作企业的主要异同是什么呢？在第3.1—3.2节所叙述的种种变化，如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和存在企业的双重依赖，在合作企业中也同样如此。不过，其程度不同；在所有的问题上（创建、停业、挑选管理人员、价格、工资、纳税、信贷），较之国有部门，合作企业所受的政府行政干预要少一些，而受市场的影响要强一些。预算约束更硬一些；非农业合作社（尤其是小型的非农业合作社）不可能指望无条件的生存和依靠行政部门几乎自动的担保^②。合作企业对价格的反映更加灵敏；它的利润动力更强^③。在投资信贷和补贴的分配方面，合作企业得到的有利待遇比国有企业要少。

合作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国有企业小得多，最近几年尤其是这样，因为创办所谓的小合作企业，较之其他规模的合作企业，能在更灵活的法律和财政状况下进行，这些都为创办小合作企业展示了更大的现实可能性。

从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看，合作社具有重要地位。合作社将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之一，甚至是最典型的基本形式，这一观点在匈牙利左派中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观念。传统的合作社理论的拥护者总是强调自愿参加原则。当今，这一原则程度

① 见G·阿戈纳科斯(Gábor Agónács et al.)(1984H)和G·泰勒(Gyula T-ellér)(1984H)关于合作企业间接行政控制的重要研究。

② 农业合作社受到更多的保护。难怪经济的这一部分坚决反对实施破产法和其他硬化预算约束的措施。

③ 在较大的合作社和国有企业之间所有这些方面的差别都不大，并且具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不同地一直应用于非农业合作社部分（在过去的合作社组织中同样不可能贯彻这一原则）。在匈牙利劳动力普遍短缺，因而现在绝大多数社员都能就入社和继续在某一合作社工作，或在其它部门工作之间，拥有名副其实的选择权。留下来的人似乎更喜欢这种形式，因为它把中等规模企业的效率与对经营决策的一定程度的参与结合起来。个人的和集体的盈利与个人所得之间的联系要比国有企业更为直接。当然，如果合作社处在竞争更激烈和更适应市场的经济环境中，合作社就必须以效率和利润来对付更强大的竞争对手，那么，最后的考验就会到来。

4.3 正规的私营部门

匈牙利改革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私营部门的成长。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这是对正统观念的最大胆的突破。

私营部门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在本节中，我们只讨论其中容易确定的那部分，即“正规的”私营部门；其它部分以及一些定义的问题将是下一部分的主题。之所以从其它私营企业中区别出正规的私营部门，是因为它得到了行政机构的正式批准。

表5反映了正规私营部门的规模。私营部门的大多数人是手艺人、建筑承包商、店主和饭店老板。他们自己劳动或者由家庭成员协助一起劳动，或者雇佣几个雇工。当政府开始放宽许可证的条件时，这个部门的规模在最近几年中有了迅速的扩大。同时，对雇工的限制也开始放松；目前雇工的最高限额，除了家庭成员之外是7人。当然，对于一般的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但是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这个数字就是大的了。它意味着“小资本主义”的合法化。我们必须指出，那些中等的或者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商业在匈牙利是被禁止的。

最近，一种新的形式已经出现：即所谓合伙经营制，它是

表 5 正规私营部门的规模 (千人)

	1953	1955	1966	1975	1980	1984
1. 私人工匠	51.5	97.6	71.3	57.4	63.7	76.1
2. 私人工匠的雇工和学徒	4.0	16.0	26.7	19.7	20.1	26.9
3. 私人商贩	3.0	9.0	8.5	10.8	12.0	22.4
4. 私人商店的雇员	—	1.0	1.5	3.4	8.2	28.5
5. 在合伙企业全日工作人数	—	—	—	—	—	11.0
6. 在正规私营部门全日工作的人口	58.5	123.6	108.0	91.3	104.0	164.9

资料来源：1—4行来源于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报告；第5行来源于财政部报告。

注：1968年以来，在国营或合作社部门有正式全日工作的个人可以获得部分时间在正规和私营部门从事第二职业的许可。1984年有4.72万人获得部分时间作为私人工匠工作的执照，3.15万人在部分时间从事合伙经营。

参加者的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型企业，是一种小型的合作社和所有者自己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混合体。这种形式也属于正规的私有部门。

正规的私营部门仍然只占整个经济的很小部分（见表1）。然而，它的成长率是惊人的：仅仅是允许其存在和大概在官方的发言中给予的一些鼓励，就足以导致其飞速的发展。显而易见，成千上万的人们具有一种进入私人经营的潜在要求；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跑步进入正规的私营部门。这还是在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私营企业在从国家部门得到投入方面处于不利条件。它很难从国有银行部门那里得到贷款，因此必须通过私人 and 经常性的非法渠道来筹集资金。私人信贷是得不到良好的法律支持的。

可以相信，逃避税收是相当普遍的；不过，税法的执行也相当马虎。因为严格地执行将吓跑从事私营企业的许多人。这就会导致更大的问题，即信心的问题。

目前在正规私营部门工作的大多数人对他们目前的收入大致是满意的。大概他们还没有全部意识到，他们收入分配的相对地位大大高于私有市场经济中的小工商业者。这些手艺人 and 小店主

通常可获得非常高的收入。在匈牙利，其中许多人属于最高收入阶层。但是，他们不能肯定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这些个人和他们的父母经历了40年代的财产充公时期，所以尽管官方一再宣布，他们的经营活动属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下永久性的一部分，但是从他们心里来说，他们还是不放心。因此，其中许多人目光短浅，追求眼前的最大利益，对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迅速而可靠的供货，或者投资于长期使用的固定资产，以建立持久的信誉不感兴趣。鼓励和禁止交替出现；平静的时期有时被高喊反对“投机”和“奸商”的交响乐队的声浪所打断。许多年来令人信服的经验表明仍然必须扩大这种受到限制的水平。

4.4 非正规的私营部门和第二经济

我们必须先说明一下这个概念。匈牙利专家们对在国有和合作社部门之外从事活动，挣得收入的定义的看法不一致。^①本文使用了下列概念。

“非正规”的私营部门有：(1)在以上定义的正规的私营部门之外的所有私营经济活动；(2)所有的收入都不是来源于在政府机构、正式注册的非赢利部门、国营企业、合作社和正规的私营工商业的劳动服务的报酬。由定义(1)和(2)组成的活动和收入并不完全一致。

“第一经济”由政府机构、正式注册的非赢利部门、国营企业和

^① 这方面的最重要的匈牙利文著述包括：伊斯特万·R·加博 (István R. Gabor) (1979, 1985)，加博和彼特·格拉西 (Péter Galasi) (1981H)，托马斯·克劳西 (Tamás Kolosi) (1979H)，帕尔·贝里奥 (Pál Belyó) 和贝拉·德里克斯勒 (Béla Drexler) (1985H)，亚诺什·梯玛尔 (János Timár) (1985aH, bH) 和卡特林·伐罗斯-西克拉 (Katalin Falus-Szikra) (1986)。格雷戈里·格罗斯曼 (Gregory Grossman) (1977)，对苏联第二经济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格罗斯曼在另一研究 (1985) 中列举了详细的参考书目。

合作社所组成。“第二经济”是正规和非正规私营部门的总和^①。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使用的划分“第一”经济和“第二”经济的决定性标志并没有合法和不合法，纳税和逃税的含义（这在西方关于“影子经济”的文献中是普遍的标准）。在我们的第二经济中许多活动是合法的；第二经济收入的一部分也要纳税。我们运用的是特定的体制分类法。第一经济在改革前的正统解释中，公认为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范围，第二经济则被认为是“非社会主义”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多样化的领域。

工作时间 工业化国家缩短工作时间后不久，匈牙利也跟着缩短了第一经济的工作时间。与此同时，第二经济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却比以往更长。一些人把在第二经济的工作作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家庭中有的成员全部时间都在私人家庭农场劳动，有的成员在国营农场或合作社工作。许多退休工人全部时间或一半时间（非法或半合法）在从事这种活动。但是多数人在第二经济从事的大部分活动是在正规部门从事第一职业的补充。他们在夜晚、周末和节假日从事第二职业。病休并接受国家的医疗服务的人这样做或者在领取第一职业工资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第二职业是不合法的。

表6提供了全部的资料。花费在第二经济的全部工作时间与花费在第一经济的全部工作时间之比高得惊人，这表明大部分匈牙利人对更高收入和消费的偏好高于对闲暇的偏好。这便是“匈牙利奇迹”的秘密之一：如果许可，人们情愿更多工作，他们为得到较高的消费而竭尽全力。在许多家庭中，人们的工作超出了体力和精力的容忍界限^②。

① 这里我们基本上采用了加博使用的第二经济的定义。加博是匈牙利这个领域中的主要专家。

② 如同在表5注中提到的那样，许多人在国有部门或合作社部门中有第一职业，同时在正规私人部门中拥有第二职业。虽然我们把这种活动看作是正规私人部门的一个部分，但是上面关于延长工作时间问题所作的评论对这一组人也是适用的。

表 6 第二经济的相对规模

	第一经济 (国营企业和 合作社)(%)	第二经济 (正规和非正 规私营部门)(%)
1. 1984年全部活动时间(包括花费在家务劳动和交通方面)的分布	67	33
2. 1984年各社会部门对居民建房的贡献(按新住宅落成数量计)	44.5	55.5
3. 1983年各社会部门在修理和维修服务方面的贡献	13	87

资料来源：第一行来源于梯玛尔(1985bH第306页)；第二行来源于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报告；第三行来源于德伦克斯勒和贝里奥(1985H第60页)。这里的两个研究报告均根据微观考察(访问和征求意见表)。

注：本表中既包括了官方统计的活动，也包括官方没有统计的活动。后一方面的数字是根据整理本表资料来源的研究工作者做出的估计。第一行的数字是包括住宅建设在内的所有生产部门活动的总计。住宅建设的活动也在第二行中单独列出。“第一经济”数字包括所谓的企业工人合伙经营。这种经营形式将在4.3节中予以讨论。“第二经济”数字中包括了家庭农业和“辅助性生产”的活动。第三行中的“第二经济”数字为正规私人部门(14%)、除“为自己消费而从事的活动”以外的非正规私人部门(19%)和在家中“为自己消费而从事的活动”(54%)三部分活动之和。

花费在第二经济活动的33%时间中，一小部分是花费在正规的私人部门，因此统计在官方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中。33%时间的大部分花在非正规的私营部门。在这个部门的活动也许可以使官方GDP的统计增加20%或者更多，当然这要取决于怎样测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家庭的作用 改革前有一种很强的趋势，这就是削弱家庭的作用，降低家庭作为生产和财产所有权单位的地位并把越来越多的活动和财产转变到大而公的国营组织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扭转了这种趋势。

这种逆转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其中伴随着许多摩擦。在某些领域出现一种真空：一些社会提供服务的原有形式不再对完全满足居民的需要负责，而家庭尚没有令人满意地取得接管这些责任的地位(Bauer 1985)。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种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重要形式：私人家

庭农业和辅助性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活动部分地服务于居民自己的需要。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是住宅建设。改革前存在着住宅建筑公有化的趋势。所有公寓都是国家的，房屋的租借由行政部门分配。这种趋势已经扭转。1980年全部建成住房的71.4%归私人所有，其余部分为国家所有。这种逆转在继续：1984年建成住宅的85.7%归私人所有^①。这种新的变化伴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紧张局面（Iván Szelényi 1983, Zsuzsa Dániel 1985）。

再一个例子是交通。赫鲁晓夫曾主张完全废除私人汽车，把发展公共交通作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出路。今日的匈牙利私人汽车过份拥挤。私人汽车的数量1966年到1984年增长13.7倍。但是修理服务、道路网络的建设和保养却不能与私人汽车数量的增长保持同步。

从“社会化”到家庭和居民自给自足的逆转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照看儿童、料理病人、做饭和其他家务劳动、自己动手修理和保养等等，表6中表明了后一种趋势的发展情况。

对消费品供给的贡献。表示第二经济重要性的另一方法是看它对消费品供给作出的贡献。第二经济在这方面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表6提供了一些说明第二经济所占极大比重的典型数据。当然还有更多的领域表中没有反映。

私人财产的收益 前面4.4节中讨论了用自己的劳动与自己的设备（例如修理工的成套工具）结合从事的第二经济活动。然而也可能有使用第一经济设备的不合法情况。另外还有把某些私人财产报酬作为第二经济收入来源的个人收入获得者。最常见的例子是转租私人住房，或把位于疗养区的第二住宅出租给长期租借者、短期访问者和旅游者^②。

^① 资料来源：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报告，1984年第470页，1985年第10页。

^② 在持久短缺的条件下，公共住宅的使用者实际上是一个“准所有者”。租用权可以继承，非法地卖给新的住户或合法地卖给国家。因此如同使用第一经济的设备一样，把公共住宅转租出去也并不是不恰当的。

合法界限 存在许多种经营情况：完全合法经营、“公开的”不合法经营、“地下的”活动，后者是法律严格禁止的那种经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非正规的私人部门或者称之为第二经济。虽然无法进行数量比较，但专家们认为，匈牙利这个部门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国家态度的直接结果。存在着审慎地使原来不合法活动合法化的努力，或者容忍那些难以决断的情况存在，只要这些活动对社会有用或者说至少无害。这种容忍唤醒大多数人口的巨大能量。虽然可以肯定这并不是令人满意的人类活动组织，其中充满了矛盾和不公平行为，但是如果不能容忍的话，这种能量将会依然处于休眠状态。但是，必须指出，容忍的精神和朝着合法化发展的趋势并没有贯彻始终。对决定鼓励还是限制正规私营部门所作的详论甚至更适合于非正规的私营部门。结果，非正规私营部门的发展很不稳定。

4.5 各种组合形式

匈牙利改革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各种不同的混合形式的试验。国家所有和私人经营或私人所有相结合。我们简单论及这三种形式。

混合所有制企业 匈牙利有几十个企业是由国家和外国私人企业共同所有的。不存在由匈牙利国家和匈牙利私人企业共同所有的企业。

出租 这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商业和饮食业中。固定资产依然国家所有，但是企业是由按照合同缴纳租金和照章纳税的私人经营的。利润归己，亏损自负，风险独当。承租人是按照拍卖的方式选择的。愿提供最高租金者签订合同。1984年大约有11%的商店和37%的餐馆是这样租出去的（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报告，1985a，第210页）

企业工人合伙经营 这种形式与4.3节讨论的“工人合伙经营”不同，后者显然属于正规私营部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工人小组。他们根据特殊的合同完成额外的工作，并得到额外的报酬，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超出国营企业雇主的范围。在许多场合，小组是由自己所在企业委任的。或者虽然该小组从企业外部获得任务，但要征得企业负责人的同意，这样的小组被允许使用企业的设备。并且只有得到企业经理的许可才能建立“企业工人合伙经营”小组。参加这种小组的每个成员都要得到他的领导许可。这方面更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可看T·拉基(Teréz Laky)(1985)和D·斯达克(David Stark)(1985)。

建立这种新形式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它使某些在4.4节所提到的不合法活动成为合法的，同时使企业对这些活动保持某些控制。许多经理赞成这样的做法，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规避中央的工资控制。合伙工人从事需要在正常工作日完成的工作，获得额外报酬。这种形式的单位数量在迅速增加。1982年为2775个，1984年底增加到17,337个（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报告1985a第326页）。许多观察家批评和怀疑在同一组织内有第一和第二工作之分是否真正有效。另一方面这种方法以后也许会导致某些内部的分权。

4.6 小结：积极地面向市场和 众多的行政限制

如上所述，改革过程创造并强化了各种非国家所有制形式和活动。勇敢地不受束缚地允许和发起这种试验是改革者们的伟大功绩。

各种不同的形式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非国营部门的经济单位（也许大的合作社是一种例外）实现了硬预算约束。在生存和发展方面，它们不能依赖国家慈父般的帮助。它们怀着追求利润

的希望开始经营，并因财务上的失败而退出经营。与国营企业进行的那些活动相比，它们的所有活动都面向着市场，对价格反应灵敏。

非国有部门起着经济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它对国有部门感受很强的“收放”波动反应不太敏感。甚至在国际收支状况严重恶化或者限制进口和投资的情况下，这个部门也能发展。然而，非国有部门也并没有摆脱行政控制。既存在永久性的限制和调节，也存在不可预见的临时性的干预，以及经常性的规则变化。我们刚刚赞扬过的同一现象，即大胆试验，也会造成相当大的混乱。经常性的变化和众多的行政限制使在非国有部门从事活动的个人无法充分发挥其创造性。但是，尽管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充满活力的非国有部门的出现，毕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刻上了新的重要的印记。

咏浪市商画版时 部小 0.1

一 解用数行的是众

咏浪市商画版时 部小 0.1
一 解用数行的是众
咏浪市商画版时 部小 0.1
一 解用数行的是众

第五章 国民经济资源的配置

我们在第三、四节中对各种社会部门进行了分析。在第五节中，我们撇开所有制形式，研究整个经济面临的问题。我们也将对不同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作一些评论。

5.1 计划制定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用语中，“计划”一词有双重的含意。首先，它涉及到事先研究可能性，比较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计划确定目标并设计实现目标的工具。计划工作的“产品”是计划本身——政党和议会接受的文件，作为政府的工作纲领。其次，计划一词也用来表示本文所称之为的直接行政控制的内容。命令经济的官方意识形态有意使人们相信这两个概念是分不开的。

我们建议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仅仅保留计划一词的第一种含意。匈牙利改革的公开文件采用了这种解释，尽管指令性计划和配给制已被废除，但计划仍需保留。

从名义上看，这个转变已经完成了。计划机构仍在工作，计划如期制订出来。然而，仔细的考察表明，计划尚未找到其新的适当的作用。人们期望，在摆脱了烦琐的“调度员工作”（即确定配额、检查执行、督促供货等等）之后，计划工作者的时间和精力能节省出来，用于研究、计算、比较和事前协调等真正的任务上来。这种可能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虽然在努力编制长期计划，但是这些计划与经济生活实际调节之间的联系是很弱的。计划在紧急状态下（例如，当匈牙利国际信贷地位恶化时）协调

3.2节所叙述的短期宏观和微观政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虽然在指令性计划下可行的旧方法不再适用，但尚未找到适应于体制改变后的新方法。

5.2 财政体制

财政系统依然极为庞大 (Mihály Kupa 1980 H, László Muraközy 1985 H)。中央政府的全部开支占GDP的比重1970年为52.8%，1980年上升到62.7%，1983年略有下降，为61.3%。

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比例与发展水平联系密切。为比较起见，我们看一下达到与匈牙利同样发展水平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1980年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芬兰为37.7%，希腊为36.5%，西班牙为29.4%^①。

政府预算集中资金流量的程度较高有几个原因。这些原因大多数都与已讨论过的问题有关，巨额补贴负担，财政深陷于投资资金的筹集，行政机构的庞大开支。财政体制的这种特征显著地证明，通过市场协调经济过程的真正的分权走得并不很远。

下一节我们讨论银行和资金市场的作用。我们这里可以先作一点评论。国民经济净收入流量中很大一个部分进入中央政府预算，不允许银行、其他金融中间机构、企业和居民在资金再分配中有较大的活动余地。这在投资分配中是十分明显的。由中央预算筹集的投资部分越大，留给可供其他投资者处理分配的资金就

① 1980年匈牙利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甚至比瑞典、丹麦、荷兰还要高，尽管这三个国家是处于经济发展的非常高的阶段，在福利方面的开支相对说来更大。政府在工业、农业、交通、商业和服务业生产方面支出(主要是投资和补贴)在GDP中的比重，匈牙利为25%，而14个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数则不到9%。这些数字是根据可比的口径计算的。其中包括了同样类型的支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支)。匈牙利的GDP是按西方的口径计算的。

所有的资料来源于穆拉考奇 (Muraközy) (1985H第746—747页) 和该作者一篇未发表的论文。

越少，运行良好的资金市场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分散化的趋势。由中央政府预算筹集的投资比重1968—1970年为40%，1981—1984年下降为21%，由银行和生产者动用自己的储蓄所筹集的投资比重相应增加（Janos Dudás 1985H）。

5.3 货币体系和资金市场

在充分货币化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是使整个国民经济一体化的手段。这由货币作为一般的交换媒介来保证。每个货币持有者都可以把货币用于他选择的任何目的。在这方面，改革前的传统体制把经济分隔开来。在体制的某些部分之间允许某种类型的货币流动，而在另一些部分之间则被严格禁止。国营部门向居民支付货币工资，但不能向顾客提供信用。居民用钞票购买由国营部门提供到市场上的商品和劳务，但不能把储蓄投资于国营部门以形成固定资产。甚至在国营部门内部，货币也只是一种“符号”。企业至少有三种货币：“工资货币”、“工资以外的其他流动资金货币”和“投资货币”。这几种货币只能用于指定的用途（Brus[1961] 1972, Grossman 1966, Kornai 1980, Tardo S 1980）。

改革放松了这方面的一些限制，经济逐渐接近货币一体化的经济。但是，与资金自由流动尚有很大的距离。

银行 直到目前为止，匈牙利还是“单一银行体系”。这方面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没有什么两样。匈牙利国家银行担负着两种职能：它发挥着一般中央银行的作用，同时也作为一个商业银行，实际上是垄断的商业银行，负责国营和合作社经济的大部分金融业务。也出现了几个专业银行，例如，外贸银行和居民储蓄银行，但这些银行也只是享有表面上的自主权。

目前打算在不远的将来建立两级银行部门。上面是发挥一般功能的中央银行，下面是一整套国有的但是竞争的商业银行，商

业银行受中央银行调节。即使在实施这种计划之前，已经建立了一些可以发放专项用途（某种投资、更新改造、推动出口等）的小的金融中介机构。无论如何，我们还无法知道这些分散化的银行部门将享有多少真正的自主权，在多大程度上它们屈服于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压力。

企业改革前的国营企业几乎没有任何选择财务决策的自主权^①。严格规定流动资金必须存入中央银行的比例。总投资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由留成利润和折旧基金筹集的。禁止商业信用。在向企业发放信贷方面，银行的垄断地位受到严格的保护。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先从资产方面来说，企业可以把钱存入银行。在不远的将来，企业也能在不同银行之间作出选择。它可以向购买其产品的别的企业提供商业信用^②。企业可以投资扩大自己的规模，或者建立小的子公司、或者仅仅持有新建企业的一

表 7 债券供应量(1986年5月)

	名义总价值 (+亿福林) ^①	收入(%)	相对规模 (%)
市民个人购买量	4.5	7—13	2.0 ^②
企业和机构购买量	2.0	7—15	9.7 ^③

资料来源：关于名义价值的资料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关于收入的数据见 Heti Világgazdaság (1986 H第55页)。

① 包括1986年5月以前发行的所有债券。

② 名义总价值 ÷ 居民在储蓄银行的存款总量。

③ 名义总价值 ÷ 未偿银行投资贷款总量。

部分股票。它可以提供资金与其他企业或机构联合建立新的公司。它可以购买其他企业或地方政府发行以及在债券市场上进行

①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讨论其他社会部门这方面的同类问题。

② 这只是贸易关系“商业化”的部分迹象。商业信用中的一个很大部分是非自愿的。买者到约定的时间也不支付帐单，这样卖者被迫提供信用。实际上这成为“软化预算约束”的一种常见方法。当然，非自愿商业信用在改革前就为人所知。

债券交易。表7提供了关于债券市场规模的情况。

在负债方面情况也类似，只需要多加一些评论。1976年以来利率提高了几倍。发放给国营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平均利率1985年为13%。这就是说，实际利率大约为5%。企业对利率提高的反应如何尚缺乏可靠的证据(Miklós Breitner 1985H, Tivadar Grósz 1986H)。尽管拒绝接受贷款申请的比例略有下降，但是依然存在对贷款的经常性过度需求。大多数观察家一致认为，投资活动的突然下降主要是通过通过对投资批准的直接行政干预、停止上马一些大的项目和缩减信贷供给实现的，而不是利率政策的影响。

以前企业信贷的来源只有中央银行。现在，如果企业想筹集资金，它可以利用以上刚刚说过的某种新出现的金融媒介。至于债券，居民可以购买，这开辟了一种筹集资金的新来源。

罗列可采用的方案比仔细考察现实给人更美好的印象。在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依然存在着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限制，如冻结存款或暂时冻结存款，限制自筹资金投资。许多可采用的方案寄希望于未来，它们尚未化为事实。例如，显然企业对购买债券没有很高热情。债券总量为数很小。大部分企业宁愿把自己的储蓄再投资于自己的生产，即使预期收入比其他企业或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报酬要低^①。

居民可采用的方案也为居民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选择余地。改革前居民可以把钱存入储蓄银行^②。他们在严格的法律限制之下也可以购买贵金属和房地产。近来允许购买债券的改革，扩大了可能的投资选择。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债券市场。这种新的可能性是重要的，但是在最初阶段它的真正意义

① 这种现象为这样的看法提供了间接的证明，即国有企业并没有很强的利润动机。它们更感兴趣的是生产能力的扩张。

② 储蓄银行支付给居民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为5%，然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近年来的通货膨胀率大约为6—9%。

还很难判断。

如前面所述，个人之间可以借款，或以“隐名合伙”的方式投资于私人企业。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法律保障，这会招致较大的风险。

总之，信贷资金市场的雏形正在出现，但是匈牙利经济距离全面的“货币化”、距离建立一种充分发展、运行良好、灵活的信贷资金市场这样一种稳固的体制，尚十分遥远。

5.4 劳动市场

在发展资金市场方面的步子不快，而朝着自由的劳动市场发生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在直接行政集权的鼎盛时期，劳动力被僵死地束缚于工作场所。存在着种种限制。行政规定，除非有明确的上级指示，禁止调换工作；没有经过特殊许可，禁止在城市就业；许多商品和劳务是通过国营企业负责人分配的，例如住房、幼儿入托、文化娱乐、食品分配或就餐、还有其他实物形式的消费品。

在改革过程中，对个人选择的前两个限制已经取消。第三种限制在住房、娱乐、医疗、和入托等方面还存在。但是，其束缚力比以前小多了。

不仅实现了普遍的充分就业，而且农业地区潜在的失业也在70年代初被吸收。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然而，对劳动力的普遍长期的过度需求与对劳动力的囤积并存，而且不排除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存在少数的磨擦性失业(Galasi和György Sziráczy 1985, Károly Fazekas和Janos Köllö 1985a)。过度需求仍在，行政束缚解除，结果是很高的退职率：1982年为15.7%，而捷克斯洛伐克同年的退职率为7%。劳动力对利益反应敏感，对不同企业所付的工资差别也反应敏感，劳动力迅速朝条件较好的方向发生流动(Fazekas和Köllö 1985bH)。在国营部门内部劳动力的流动是如此，在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更是如

此。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提供的收入吸引了离开支付收入低得多的国营企业的劳动力。正规的私人部门可提供全日制就业机会。第一经济的职工可以从事非正规私人部门的活动，例如“第二职业”，甚至在第一经济的规定工作时间不合法地从事第二经济的活动。无论如何，额外的活动都耗尽了个人的体力和精力，因此，使他无法在第一种职业中全身贯注地积极工作。这是行政调节的隐蔽成本。虽然国营企业不能提高工资，但是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规避了这些限制。这是一种痛苦的两难处境。如果其他情况诸如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疲弱的利润动机、软预算约束等依然没有改变，简单放弃工资控制有弊无利。它只会导致更大的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压力(Gábor和György Kövéri 1985H, Falus-Szikra 1985H)。

5.5 小结：各社会部门既和平 共处又相互竞争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体制改变的描述，下面作一概括。

匈牙利是多种经济部门并存的经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同时存在并相互竞争。然而，竞争是在不平等条件下的竞争。我们可以简单化地把政府机构的偏好次序归纳如下：1. 国有大企业；2. 国有小企业；3. 农业合作社；4. 非农业合作社；5. 正规的私有部门；6. 非正规的私有部门^①。这种次序是根据保证生存（1, 2, 3, 4），最有把握的是1）和获取贷款的地位（1, 2, 3, 4）排列的。正规的私营部门只是偶然可以获得这些优惠。非正规私营部门无优惠可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际生活中各种经济成分的相对地位服从这同一顺序。我们可以再次带有某些简单化地说，实际生活中的地位与下面这些麻烦和负担有关：微观干预、检查监督的频率和

① 在某些场合，大的农业合作社获得比小国有企业更优惠的待遇。

程度，特别是对价格和工资决定的干预和税法的强制性。在这些方面，非正规的私人部门获得远远躲开行政机构眼睛的好处。这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什么许多人宁愿在国家偏好尺度中处于较低地位的部门工作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些部门很少能得到正式的优待。

在所有部门，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都完全掺合在一起。在我们所列的国家偏好尺度中地位越低的部门，对市场的调整就越自由。这并不是必然的，因为行政机构并不是有意地批准这种自由，而至少部分地是由于不可能对几千个经营单位或几百万个人使用对几百个大企业同样的方法。而且甚至正规和非正规的私营部门都不是在“自由”市场上运行。行政机构规定了法律允许的范围，手中掌握有许多限制和干预的工具。

各种部门间虽然给人一种相互补充的感觉，但也给人一种相互竞争的感觉。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冲突。处于国家偏好次序中地位较低的部门受由行政机构调节的许多分配过程之苦，它们被地位较高的部门“排挤”出去。同时，同一偏好地位较低的部门可能在市场竞争中成功地“挤掉”国家偏爱的部门。最重要的例子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即在争夺供不应求的劳动力时取胜。

总之，匈牙利经济是一种在间接行政控制下的国有部门和面向市场但在很强的行政限制下经营的非国有部门构成的混合经济。社会各种经济成份之间一直以各种方式既和平共处又相互竞争。

第六章 紧张与不平衡

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创造供求平衡的预期联系在一起。匈牙利是否已建立了这种平衡？以前行政命令经济的紧张和不平衡特征是否已不复存在？或者出现了其他问题？这是检验改革的试金石。

6.1 传统的短缺经济

改革前的匈牙利传统体制深受长期短缺的折磨。同样，短缺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著述有作者〔1957〕（1959），富兰克林·D·霍尔兹曼（Franklyn D·Holzman）（1960）和赫伯特·S·莱文（Herbert S·Levine）（1966）。笔者在《短缺经济学》（1980）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短缺现象及其因果关系。许多产品市场上存在着普遍的过度需求，到处都是购物的队伍，顾客被迫购买可以获得但并不特别需要的商品，用以替代希望得到的商品，或者被迫推迟购买，进行强制储蓄，等等。短缺现象不仅折磨着消费者，同时也困扰着生产者，因为生产者又是投入品的购买者。也存在着对投资资源和外汇的过度需求。有些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劳动力的短缺。短缺具有溢出效应：投入供给的短缺使生产出现瓶颈，瓶颈影响正常生产并引起其他领域的短缺。供货不可靠诱发了对

投入的囤积。短缺孳生着短缺^①。

持久短缺并不排除资源闲置、生产能力过剩、存货积压过多现象的出现。相反，因为对投入物的囤积，因为瓶颈经常发生使生产要素不能充分利用，短缺甚至有助于制造不必要的过剩。

持久的短缺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买者因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心情惆怅，被迫根据现有供应进行调整。这种情形意味着市场有利于卖方，而不利于买方。顾客常遭售货员粗暴对待，甚至羞辱。在生产中，供应方面的干扰和投入-产出组合上的应急性强制替代致使效率下降。卖者不愁没市场，买者只好甘愿无条件接受能得到的物品。这种短缺情况带来了最有害的后果，缺少提高产品质量和改进生产的动力。

持久短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混合产物。

尽管在宏观政策方面努力限制需求，但是体制存在着产生过度需求的趋势，最强的力量是所谓的投资饥渴，对投资资源永无止境的需求。这种饥渴症在各级行政管理机构都会产生，上至追求高增长率的最高政策制订者和计划者，下至有扩张倾向的工商企业经理。这种情况与3.3节讨论过的“软预算约束”综合症密切相关。因为用不着对可能的投资失误担忧，几乎不存在投资申请者对投资资源（即项目批准、财政补贴、获得贷款）需求的自我抑制。决策者的预算没有严格的约束，他的扩张欲望也不受约

① 有一个讨论中央计划经济的重要的思想学派，人们常常正确或不正确地称它为“不均衡学派”。这个学派否认改革前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或者至少是这种经济中的消费品市场上短缺的长期性。这个学派的理论领袖是理查德·波特斯（Portes和David Winter 1977, 1978, 1980; Portes, Richard Quandt, Winter和S.Yeo 1983; Portes 1986）。利用这个学派的理论思想和经济计量方法进行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有价值的研究。更多的文献目录可看波特斯1986年的著作。

本文作者与这个不均衡学派不断进行争论（Kornai 1980, 1982）。争论集中在超额总需求的加总、测量和概念解释、消费品市场与经济中的其他市场的分割、需求与供给的互相独立与共同决定、强迫储蓄的存在、短缺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下一节中我们将回头分析不均衡学派的某些经验结论。

束。

在中央经济政策积极倾向于强制增长时期，投资突然加速。投资者随中央政策的脉搏跳动。政策一收一放，投资减少和加速，引起经济的波动（Bauer 1978, 1981H, S o s 1975—1976, Mária Lack 1980, 1984）。

前面提及的囤积趋势扩大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买方不满足于得到马上需要的物品，而且要求购买以后也许用得着的一切物品。

生产者对进口中间产品的需求也十分强烈。为清除外贸不平衡，中央政策要求促进出口。而国外进口商的需求自然是受到约束的^①。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公司仅仅为了通过出口增加外汇总额便以低价出卖商品。如果对外倾销损害了国内利益，软预算约束也能掩盖这种损失。换言之，国营外贸部门对出口商品生产者产品几乎是没有限度的需求，只能使不断加大的总需求量更加增大。

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性的。在传统体制下，家庭收入处于严格的集中控制之下。从而，家庭过度需求是否可能出现取决于首先通过价格和工资政策来实施的对宏观需求的管理。不过，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某些时期，家庭过度需求是总需求不断增大的主要根源之一（波兰最近5—10年就是一例）。

相对价格被扭曲了。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低得近乎荒唐或者甚至免费分配，从而产生一种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

这种体制的适应性很差有许多原因。就短期调整而言，投入—产出组合的快速变更要求生产全过程储备各种生产辅助要素，以作为机动。如果一、二种要素短缺，瓶颈状态会使灵活调整不可能。长期调整也很慢。想利用意外机遇的企业家应该得到未加利用的滞存资金，但是抑止不住的投资饥渴动用了所有的投资资

^① 其他一些对某些商品产生进口饥渴的短缺经济除外。

源。纯收入中很大比重集中于中央政府预算，项目批准上繁文缛节的行政手续，缺少资金市场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对可转化资源的迅速分散调节。

体制的适应性也取决于生产者的动机。生产资料的卖者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一方面，他不能对忿忿不满的买者的催促无动于衷，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买主得到了自己上级支持。另一方面，他又对维持短缺深感兴趣。短缺会使他的产品不愁销路，他的生活可安逸些，用不着花太多精力去注意产品质量、送货时间、成本等问题。

在引起短缺的各种因素中，哪个因素更主要人们是有争议的（Soós 1984, Szabó 1985H, Stanislaw Gomulka 1985, Kornai 1985a, b)。不过，在解释持久性短缺方面，所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被普遍接受。

第3.1、3.2和3.3节叙述过的问题：直接的行政控制、软预算约束、对价格反应迟钝以及刚刚讨论的关于造成持久短缺的原因和结果，这些问题都是紧密联系着的，或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体制中互为相关的属性。持久短缺是完全排斥市场调节和行政协调占主导地位的体制的必然产物。同时，短缺对于命令经济又是必不可少的。它使命令经济得以合理存在：因为短缺，所以需要物质配给，需要行政干预经济，需要绷得紧紧的计划；短缺是种激素：刺激生产者多多生产，因为他们的产品是顾客急需的；短缺还是运转不灵的适应机制的润滑剂：尽管产品质量差、送货不及时、对需求作出的调整慢，但是全部产品仍有人要。

6.2 短缺的存与亡

匈牙利已开始摆脱传统的短缺经济。在几个重要领域，变化是明显的。观察家们都承认，匈牙利的食品供应及许多工业消费品供应比其它东欧国家好得多。1985年冬，笔者写作本文时，匈

牙利家庭用电、暖气都供应上了，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要采取严厉措施敦促人们停止使用能源取暖。

尽管出现了明显改善的迹象，但是因为情况复杂且不尽相同，还需要作细致的考察。我们先把重点集中到还存在短缺的地方，从考察几种消费品和服务的供应着眼。

政府非企业组织免费或以名义的价格独家提供的服务^①。最好的例子是看病。这里同样存在几乎不可满足的需求。挂号平均要排很长的队（急诊除外），病人挤满了各处的医院及诊所，大夫匆匆忙忙地给病人检查身体，等等。还有合法的私人诊所，不过那里只有当官的才上门求医。由于看病难，医护人员能得到一大笔小费。

政府独家按现行价格提供的服务。最明显的例子是电话服务。该部门短缺现象尤其严重。在过去25年里，电话机的数量以年平均4.5%的速度增长，而申请装电话的数量却以年平均7.6%的速度增长。等候安装电话的时间越来越长，如果其它条件不变的话，装一部电话大约要等上15年。电话网被超负荷使用，顾客往往得等很久才能拨通电话，而且老是占线，串线现象时有发生。

由双重体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典型的例子是住房。大多数城市住宅都是公有财产，以极低价格出租，房租只占建房和修理费用很小的一部分。虽说对居民排队等分房的资格（以收入、家庭人口多少为基础）有较严格的限制，但是在首都仍要花几年才能等到住房。其它能用来出租的还有私营房产部门的房子、家庭私房、及能租的房子。私营房产部门的房价及房租昂贵。虽然存在房地产市场，但摩擦很多，而且几乎没有经营不动产的中间机构（Dániel 1985）。

^① 每种价格都有一个临界值。在这个临界值以下，需求的价格弹性为零，因此，这种价格便是名义的。在临界值之上，需求的价格弹性变为非零，也就是说，这种价格是实际价格。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许多商品和劳动的价格是名义价格。

汽车分配是双重体制提供商品的另一例证。新车由国营公司独家供应。购买一辆汽车平均要等2—3年时间。可以看到，供应对需求作出的反应是倾向于维持短缺的状况。如果车价上涨遏止了对汽车需求的增长，当局和汽车的垄断卖主们也会减少汽车供应(Zsuzsa Kapitány, Kornai和Szabó 1984, gnes Tibor 1984 H)。大约有1/10的新车卖给了不用排队的享有特权的顾客。经营汽车的另外一个辅助部门是私营的旧车市场，那里的车价由供求关系决定。

进口消费品 大宗的由国营公司进口和分配。进口消费品供应行情变幻莫测，时而供求平衡，时而供大于求。有时，进口货的需求是由来自西方的新商品创造的，一旦这类商品货源切断，又会引起短缺。匈牙利旅游者私自从国外携带回的商品可稍稍弥补这种短缺，这些商品（很多情况下是走私品）在非正规市场上出售。

由各种社会部门同时生产和销售的商品和劳务。这些社会部门既包括正规的私营部门也包括非正规的私营部门。这里存在各种情况。最突出的情况是总量供求平衡的大宗商品。例如，商店里摆满了鞋和肉制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满足顾客需求。因为顾客常常碰不到他正寻找的那种鞋和肉制品，只好强制替代。商店里某些商品存货过多，另一些商品柜台空荡荡的情况可以同时存在。关于卖者的态度，在有的市场上，可以看到一种健康的竞争，注意力放在满足顾客的需求上；而在有的市场上，短缺现象如故，私人卖货者展示了流行于卖方市场的所有积弊：态度粗野、想办法欺骗顾客等等^①

用作中间产品的商品，短缺更为经常。与其它东欧国家或本国50年代初期不同，目前匈牙利的企业可以免受横蛮切断能源之

^① 卖者对买者的态度是由某一社会部门（国营企业或私人企业）卖者的数量和市场不均衡的态势（卖方市场或买方市场）决定的。匈牙利的经验表明，第二种因素最为重要。

灾。引起企业大量亏损的原因是供货不能保证，进口中间产品尤其如此。这种产品供不应求给生产造成极大的困难(Gács 1982)。存货结构的指标很有启发意义。在短缺经济中，企业囤积投入存货，产品很容易脱手，因此投入存货与产出存货之比相当高。而在一个主要是销售困难的经济中，情况正好相反(Ervin Fábri 1982, Attila Chikán 1981, 1984H)。表 8 说明，匈牙利国营生产部门依然更具有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的特征。

表 8 制造业存货结构的国际比较

国家 (观察年份)	投入存货对产出存货的比例	
	最低	最高
1. 奥地利 (1975—1976)	1.04	1.07
2. 加拿大 (1960—1975)	1.06	1.40
3. 英国 (1972—1977)	1.20	1.56
4. 匈牙利 (1974—1977)	5.72	6.38
5. 匈牙利 (1978—1984)	4.90	5.25

资料来源：第1—4行来源于奇坎 (Chikán) (1981年第84页)，第5行来源于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报告。

注：“投入存货”包括已购买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存货，“产出存货”包括待售商品。更详细的定义可看资料来源。

前面讲过，总的看来匈牙利还存在对贷款特别是对长期投资贷款的过度需求。因为70年代后期，削减了贷款供应，贷款压力越来越大。削减贷款是为了改善匈牙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而采取的宏观总调节计划的一部分。中央强烈地干预之后，投资活动以及对投资品的需求下降了。

结论是，目前匈牙利经济中短缺的情况没有改革前严重，一些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短缺的困扰。这些变化更多地是由于各种经济成分比重的变化，而与占主导地位的国营部门的变化关联甚少。正规与非正规的私营部门在填补国营部门留下的空缺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即便如此，短缺尚未清除，因为

产生短缺的很多原因还没有消除。^① 继续存在一种恶性循环：重新集权化导致短缺，短缺又有助于重新集权化的趋势。

6.3 通货膨胀

如表 9 所示，在过去 10 年中，匈牙利的通货膨胀加速了^②。流行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加速是改革引起的。尽管这种观点不无一点道理，但却过于简单化了。改革开始前，价格和工资受到严格控制而且长期固定不变。企业对利润尤其不感兴趣，因而它

表 9 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

	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平均上涨幅度 (%)			
	1960—1967	1967—1973	1973—1978	1978—1984
奥地利	4.8	4.9	6.8	5.2
芬兰	4.8	6.6	13.8	9.2
葡萄牙	3.4	9.3	22.1	22.9
西班牙	4.1	6.8	18.8	13.9
匈牙利	1.0	1.6	3.9	7.5

资料来源：联合国报告，1970年第524—529页，1979年第690—696页，1983 b 第200—206页，1985 b 第220—224页。

① 本书46页脚注中提到的不均衡学派在匈牙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卡特林·胡里亚克 (Katalin Hulyak)(1983H, 1985H)。根据一种不同的(或者至少是部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估计方法，波特斯和她的助手们得出了与上面提出的观察一致的经验结果。她说明了对住房、汽车和投资资源的持久的过度需求。她指出了消费领域普遍短缺程度的波动。波动的持久性及其表现与其他一些研究(例如，Kornai 1982)所揭示的波动有密切的联系。

② 我们把匈牙利与一些和匈牙利发展水平(按人均GDP测量)相近的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实例进行比较。我们没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进行比较，因为没有这些国家编制价格指数统计方法的足够信息。

许多分析家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一直存在某些隐蔽的通货膨胀。由于测量方法的有意偏差，某种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全部反映在官方公布的价格指数中(Kornai 1980年15.4节和Domenico M. Nuti 1985年)。

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提高价格。然而，在最初的改革措施推行之前很长时间，就一直发生着缓慢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在公布的价格指数中完全反映出来）。改革事实上在许多领域中放松了对价格和工资的控制并且多少增强了企业对获取高额利润的兴趣。然而，这些变化还不足以充分解释造成通货膨胀加速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近几年，中央宏观政策总是谨慎地运用通货膨胀措施作为紧缩计划的手段。匈牙利存在严重的外债、外贸条件恶化问题。决策者决心用各种可能使用的手段使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其前提是强行遏止及削减国内消费的增长。从而许多基本消费品和劳务的价格在政府指令下一再上涨，同时政府又决定提高名义工资以期部分地抵销物价上涨对消费者的影响。中央有意提高物价和增加工资，带动了整个价格水平的上涨，其中包括正规和非正规价格和收入的提高。^①用第2.2节引入的术语，可知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政策的改变而不是体制的变革。改革前某些时期，也采取过类似的政策。例如50年代初，政府曾运用突然涨价的办法有意控制了生活水平。

在这方面，中央的政策是相互抵触的。当中央决定的涨价引起了通货膨胀时，就有一些官方文件指责企业经理们及正规和非正规私营企业乱涨价、唯利是图。相当多支持改革的专家们感情上显示了类似的矛盾状态。他们认为，只要通货膨胀速度不过快，可能对改革有帮助。因为它便于理顺被扭曲的价格和修正不合理的工资。实际上，同样的观点也可以从为涨价辩护的官方文件中找到。包括笔者在内的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感到，随着局部价格上涨时序的拖长，匈牙利正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每一次价格局部上涨对生产成本或者生活费用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价格永无休止

^① 遗憾的是，尚未通过理想的方式组织对正规和非正规私营部门价格和收入进行研究。皮奇尼格（Petschnig）（1985aH，1985bH）提供了这些部门价格上涨比经济的其他部门要快得多的许多例证。

的局部上调会导致一个人人皆知的恶性循环过程：即物价—成本—工资—物价的螺旋形上升（Klára Csoór 和 Piroska Mohácsi 1985H）。那会对分权化的核心问题即严肃财务纪律、根据价格和利润进行合理计算带来极大危害。低下的经济效益可以轻松地通过提高成本、转嫁给买者获得补偿。

人们最近谈论短缺、通货膨胀和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短缺、通货膨胀加剧、外贸逆差、债务负担日益严重、还本付息困难、或者任何一种紧张和有害的不平衡都会成为重新集权化的天赐良机。这些现象为压制市场力量，恢复对经济的严格控制，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干预，对中间产品实行配给，提供了合理的根据。这是一种陷阱，因为重新集中化深化了那些造成很多困难的因素。有时，重新集中化伴随着一本正经的许诺，采取的一些措施只是临时应急性的，将来也只在出了问题的场合才使用。但问题是那些临时性的行政措施有变成永久性的趋势，因为这些措施使产生困难的根须复活了。

6.4 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

外贸和国际收入不平衡并非是一种体制下特有的现象。许多非社会主义经济也正为这个问题所困扰。本文把注意力特别集中于匈牙利外贸不平衡与体制变革和客观政策之间某些特有的联系方面。

关于外贸和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匈牙利国内外一直争论不休。它们的产生是否主要因为外部条件的恶化（日益不利的外贸条件、西方对进口品持强烈的保护主义、得到的外国贷款较少、利息率提高）？或者是因为国内对变化中的外部经济条件反应迟钝？谁也不否认，两组因素都发挥了作用，分歧在于何者作用更大。有人强调用后一组原因解释失衡，笔者持同样的看法。也就是说，匈牙利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未能作出有效的调整。

表10和表11说明, 1973年—1974年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为匈牙利外部经济形势的转折点。在这之前, 匈牙利经济增长率和欧洲私人市场经济的国家增长率相当接近。然而, 在对石

表 10 匈牙利1957—1984年间经济增长指数

	平均年增长率(%)			
	1957—1967	1967—1973	1973—1978	1978—1984
	(按不变价计算)			
1. 国民收入	5.7	6.1	5.2	1.3
2. 投资	12.9	7.0	7.8	-3.0
3. 工资收入者人均工资	2.6	3.1	3.2	-1.4
4. 人均消费	4.2	4.6	3.6	1.4
		1972—1973	1973—1978	1978—1984
		(按现价计算)		
5. 可兑换货币债务总额		16.0	38.9	2.8

资料来源: 第1—4行来源于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报告。第5行来源于《国际货币评论》(1981年第31页), 《季评》(1985年第33页)。

注: 国民收入的概念见表1脚注的解释。

表 11 建筑业活动增长率的国际比较

	年 增 长 率(%)		
	1968—1973	1973—1978	1978—1981
奥地利	5.5	1.0	0.0 ^①
芬 兰	3.9	1.1	1.8
葡萄牙	8.9	0.9	-
西班牙	5.9	-2.1	-1.9
匈牙利	6.6	5.7	-0.6

资料来源: 联合国报告1979第365—368页, 1983a第827—830页, 1985a第828—829页。

注: 我们用建筑业活动作为投资活动的代表。

① 奥地利的最后一个时期为1979—1980年。

油危机作出的反应方面, 匈牙利和它们则存在明显差异。当资本主义经济由于石油危机陷入停滞和衰退时, 匈牙利经济还在强制

增长的路上昂首阔步。扩张冲动没有中止，国外贷款易于获得。外债累积是两种因素相互纠缠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一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不间断增长的客观经济政策；二是缺乏真正的分权，即对经济的改革没有贯彻始终。在这方面，要把“政策”带来的问题与“体制”带来的问题区分开来是困难的。体制改革不彻底导致（至少强化）了各级政府的扩张政策。预算约束的软化和推迟国内相对价格的必要调整，掩盖了企业由于西方市场的缩小和匈牙利外贸条件的恶化导致的亏损^①。这是国营部门改革还停留在表面上的确证：没有把国家的困难“下放”给企业，结果没有迫使企业面对新的世界市场形势作出调整。对在建的新投资未加限制，也没有仔细地选择与新的外部需求结构非常相适应的项目，而是不加鉴别地乱投资，投资饥渴症一犯再犯，而且受到强制增长的客观政策的鼓励。

经过长期的延缓，面对由于国家在国际地位中出现的危机，宏观政策才作出反应。来了个急刹车：采取紧缩政策，大砍投资并降低实际工资。这样，集中化政策又再次基本上保留了下来。这不是分权后的当事人对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转化为分散的国内信号）作出的市场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分散信号发挥的作用相当小。这是重新集中化的结果，是行政干预政策的复活。这种政策支持进口替代及以昂贵代价强制扩大出口，旨在解决外贸失衡和国际债务清偿这样最棘手的问题。匈牙利的外贸收支状况改善。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匈牙利的信誉是相当好的。但是引起外贸不平衡的深刻根源仍然存在。直接和间接的行政控制不能“和谐”相处。一种体制不能有两副面孔：对生产内销产品热情低、供货迟缓、生产改进和技术革新进展慢，而为国外顾客生产时，情况则截然相反。外贸效率只有通过改革过程中出现突破才能保证

^① 石油危机冲击的影响也因匈牙利能获得苏联低于世界市场价格水平的能源供给而减弱。

(Marer 1981, Balassa和Laura Tyson 1983, András Köves和Gábor Obláth 1983)。

6.5 个人选择和收入分配

现在到我们该结束本文的描述部分的时候了。在转而讨论“设想”问题以前，还应提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体制改革和过去遗留以及新出现的紧张和不平衡如何对每个市民产生影响？如表10所示，实际消费水平经过使人难忘的短暂增长以后，增长势头开始减缓。我们在上一节已指出，这种减速的账不应算在改革上，它应由不幸遇上恶化的外部条件、政策失误以及由于体制改革中的不配套引起的面对外部条件变化调节乏术等原因来解释。不过，更值得一谈的不是官方统计中披露的真实消费水平，而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不同层面：个人选择权。

我们的讨论仅限于经济方面。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选择不是本文的课题。必须注意的是，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不是一个该不该有的问题，而是一个自由选择度是深还是浅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经济选择不同方面自由程度的变更。

在传统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单个家庭可以在预算约束范围内选购在市场上的商品和劳务。但是因为很多原因，这种情况离消费者主权还相距甚远^①。占消费品总量的很大部分是通过非市场渠道由行政程序作为各种小额优惠来分配。即使是由市场分配的那一部分消费品，持续的短缺也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即买者购买到的不是他要买的商品，而是他能买到的商品。一再出现的强制替代是对经济自由的亵渎。价格并不反映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供应对价格也无动于衷。消费者的选择对供应结构影响甚微。相反，带有主观任意性的消费品相对价格规定了需求的格局。

^① 关于这个问题在 Ferenc Fehér、Ágnes Heller和 György Márkus (1983) 的著作中有大量的讨论。

一部分储蓄由于短缺所迫。甚至于强制替代以后，实际上人们手中还有些钱花不完。这些钱只有在医疗营养费和将来退休津贴之间作些选择。行政体制在这些方面的安排已完全制度化了。储蓄是不能用于生产投资的。

个人选择职业也受到限制。虽然他们可以免受失业之苦，但是在职业选择上，他即使不需听命于人，至少也得“流到”规定好的方向。在很多情况下，工作单位一经确定，调换便受到行政命令的严格限制。

匈牙利改革的伟大成就就在于大大放宽了各种选择。同时改革的很大缺陷也在于对选择的放宽走得尚不太远。

消费者的选择面已比较宽了。虽然，短缺程度降低，次数减少，但并没有消除。行政配给的商品和劳务虽未取消，但范围比过去窄了。有些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能够把消费者提供的信号转达给生产者，生产者通过改变供应结构对这个信号作出反应。但是这种联系还囿于一定领域，主要是在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非国有部门，甚至是市场功能被扭曲的领域。除此之外，在经济的其它领域，供应结构还受各种影响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组合的制约。这些影响不仅来自有法令保护并由精心制定的计划推动的影响，也包括来自对消费者自由选择实行家长式的任意行政干涉的影响和消费者决策的影响，最后还包括纯粹是随机效应的影响^①。

关于消费者手中的余钱是用于储蓄还是投资的选择也放宽了。最重大的变化是个人可以投资建造自己私人住宅，而不必消极地等待政府分配住房。事实上，由于行政干扰、短缺、缺乏贷款等原因，购买或建造一间房或一个单元房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在持有金融资产方面也有了新的选择，虽然可选择的范围还非常小。除了可以在医院保险和退休津贴这两个项目之间进行选择外，

^① 对消费者选择的任意干涉可由对消费品征收差别显著的流通税得到说明。对个人偏好施加的任何合理的社会偏好都无法解释对日用化学产品征收+11%，对鞋征收+5%，而对糖和鱼分别征收-11%和-26%的营业税率（Csikós-Nagy 1985 H第58页）。

仍然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目前，个人在决定就业和工作方面，有比过去大得多的选择。对劳动力流动的行政限制已经取消了。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刺激正规和非正规私营部门发展的新机会。那些认为自己有经营能力的人有了一些用武之地（还很小）。那些为了高消费愿意多干活的人可以从事第二经济。罗伯特·塔多斯（Robert Tardos）（1983H）的研究表明，在对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作出的反应中，有47%的家庭选择了在第一经济和第二经济部门多干活的方式。因为他们要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此外，选择仍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诸多磨擦和行政限制的制约。

表 12 收 入 分 配

	在全部统计的货币收入中所占比重 (%)			
	1967	1972	1977	1982
第一组	4.1	4.0	4.5	4.9
第二组	6.0	5.9	6.3	6.4
第三组	7.1	7.0	7.3	7.3
第四组	8.0	7.9	8.1	8.1
第五组	8.9	8.8	8.9	8.8
第六组	9.9	9.8	9.8	9.6
第七组	10.9	10.8	10.8	10.7
第八组	12.2	12.1	12.0	11.9
第九组	14.0	14.0	13.7	13.7
第十组	18.9	19.7	18.6	18.6
不平等程度的测量	1.92	1.96	1.84	1.82

资料来源：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报告。

注：前10行数字的含义是，把人口按人均货币收入递增的顺序排列，并分为10组，第一组的第一个数字意味着，最穷的10%的人口，1967年时在全部人口统计的货币收入总量中占的比重为4.1%。

“统计的货币收入”不包括统计的非货币收入（例如实物福利），也不包括在第二经济中挣得的大部分未统计的收入。

最后一行表示的是匈牙利中央统计局计算的不平等程度的综合测量。收入获得者被分成两组，第一组是平均收入之上的收入获得者，第二组是平均收入以下的收入获得者。“不平等程度的测量”为第一组人平均收入与第二组人平均收入之比。

个人选择问题与收入分配紧密相关。改革前的体制将限制个人选择与某种平均主义趋势结合起来。尽管从来没有过完全的平均主义分配，但国有部门和合作部门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不大的。行政职务很高的人享有的特权，更多地不是表现在较多的货币工资形式上，而是表现在其它津贴上：汽车服务、分配较好的住房、进出于货源充足的特殊商店、特别医院和专门的娱乐场所等等。

如前所说，匈牙利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和职业保障。职业保障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几位经济学家指出它对职业道德和人为地保留效率差的生产线产生的消极影响。表12的数字显示，第一经济中收入差别的程度缓慢地下降了。还有人认为，第二经济的迅速发展抵销了这种变化，也许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但是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实这种推测。另一些详细的研究（Kolosi 1980 H, Szelényi 1983）表明，现在的匈牙利既看不到改革前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盛行的那种不平等，又看不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那种不平等，而是两者的特殊组合。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基于一个人行政地位不同产生的差别，但这种差别较小地表现为按实物支付的形式，而是更经常地表现为货币收入的差别（这种转变还不完全，尚存在实物形式上的特权）。同时，市场特别是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的出现创造了新的不平等。当收入的上限增长时，对收入下限的社会政策没有足够的发展。长期以来，改革家们有片面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只关心经济增长、有效的适应、贸易平衡、财经手段调节等等，而没有对社会公平的道德目标予以足够的关注（Zsuzsa Ferge 1984 H）。

在这方面，匈牙利也成了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分配结果造成的混合物。

第七章 设想与现实的对照

我们叙述了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以后，将谈谈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设想。^①第7.1节和第7.2节讨论过去的设想，第7.3节和第7.4节讨论匈牙利现在的设想。有的设想是兰格模式这类纯理论的形式，有些设想则是规范理论和实际建议的混合物。

7.1 奥斯卡·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

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争论的文献（包括原著和以后的评论）可以说是洗牛充栋^②。本文不可能涉及所响这些文献，只能集中谈谈作为争论中心的兰格的经典论文（1936—1937）。

第一个问题是匈牙利的经济改革现实是否是“兰格经济”或接近“兰格经济”，根据以上所说，读者已经可以肯定回答：“否”。

更详细的回答需要谨慎。兰格在他的论文中只是提供了一个“模式”。模式自然要把同主要论点无关的复杂的现实细节抽象掉。因此，仅仅指出现实比模式更丰富，是对理论模式廉价和不

^① 市场社会主义的可选择设想仅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可选择形式的一小部分。

^② 这场大论战中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恩里克·巴罗尼（Enrico Barone）[1908]（1935），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920]（1935），弗雷德·M·泰勒（Fred M. Taylor）（1929），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935），当然还有兰格（Lange）的论文。艾伯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的评论（1948）是经典的概括。后来伯格森（1967）、阿列克·诺夫（Alec Nove）（1983）和唐·拉沃伊（Don Lavoie）（1985）又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观点。

公正的批评。我们只是根据同匈牙利现实的对照和以后对这种理论的批评，简要地谈谈这种理论的最实质性的假说和特点。

兰格认为具有可能性的是社会主义将是一种由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所组成的双重经济。但是他只对公有制部门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有争议的建议。因此，把兰格模式同匈牙利国有经济加以比较是合理的。

兰格的经济具有瓦尔拉斯的信息结构。依靠价格体系和观察过度需求来提供充足的信息，并通过试错法来建立瓦尔拉斯的均衡价格，或至少接近于这种价格。当事人对价格作出反应。与此相对照，匈牙利企业的产品价格即使在改革以来也并不是瓦尔拉斯价格，或接近于这种价格。官方文件甚至没有显示出在经济的任何地方去建立市场出清价格的意图（奇科斯-纳吉1985H）。国营经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并没有反映稀缺性。非国营部门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可能接近于瓦尔拉斯均衡价格，但有很大的变形。国家部门的非市场出清价格波及价格体系的其余部分。撇开价格能否给予正确信号不说，主要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对价格反应很弱。在许多场合，它们更加注意其它信号。

在兰格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相反，匈牙利的企业有多重目的。谋取更大的利润，只是目标之一，而且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利润刺激由于软预算约束综合症而弱化。企业对上级行政机关的纵向依赖高于它们对市场的横向依赖。

在兰格经济中，中央机构将其活动限制于确定价格上，而在匈牙利经济中，行政机关忙于干预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干预价格的形成只是它庞大活动的一小部分。

问题还不止于此：兰格经济的建立是可行的和合乎需要的吗？前一个问题是根本的，因为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第二个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当然，一个国家的经验不可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它有助于对所提出的论据进行再思索。

兰格模式是建立在对“计划者”的错误假设之上的。^①他设想的中央计划工作者是柏拉图式哲学家的再现，是大公无私和聪明智慧的化身。他们没有非份的要求，而是严格地执行“规划”，对超过需求的价格进行调整，这种超自然的行政机构无论过去或将来都决不可能存在。政府官员反映社会的分工，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他们追求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包括追求他们所代表的集体的利益。权力本身就会产生不可抵抗的诱惑使人们去使用权力。行政官员由于他在社会中的作用必定是干涉主义者。这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的。在匈牙利，至今微观干预很多，这决非偶然。这是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必然的产物。因此，重新集中化的固有倾向总是占据优势(Terez Il-laky 1980)。

兰格模式同时是建立在对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的。他期望企业会遵守体制设计者制定的规则。但是，社会并不是一种娱乐性的客厅，在那里发明者能够随意地发明规则。组织及其有切身利益关系的领导人有着各种深刻的动机；生存、发展、组织的扩大、组织内部的和平、权力和声誉，追求容易达到这些目标的环境。上级可以推行一种人为的奖惩刺激制度。这种制度可以支持上面提到的不公开宣布的动机。但是，一旦这种制度同上面这些动机发生冲突，对这种制度的贯彻执行就会犹豫不决，或对它作出模棱两可的解释。组织的领导人就会去影响贯彻制度者，或者试图违反制度。

现代社会学、经济学、行政、等级制和组织的社会心理学对这些方面的论述是众所周知的。30年代的兰格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生活在瓦尔拉斯纯理论的贫瘠的世界中，并没

^① 当兰格写他的论文时，其头脑中对中央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是有争论的。在给哈耶克的私人信件中，他指出了在真正的竞争占优势的部门中，市场力量在直接决定价格方面的重要性(Tadeusz Kowalik 1984)。本文不讨论兰格30年代的思想，而是讨论从发表到今天已为专家们（在谈到兰格的教科书和论文中）接受的所谓兰格模式。

有考虑到他的基本假设的社会政治基础。

兰格希望用行政程序来模拟市场。这种希望在匈牙利的现代著作（例如，奇科斯-纳吉1985H）中一再出现。在这种思想的逻辑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行政官员大军几乎要随时随地调整成百万种产品的价格。兰格的现代信奉者可能说，用电子计算机只决定总量的价格指数，同时给当事人规定分解这些总数的计算原则。在匈牙利或多或少地采用过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如果这些原则同企业的利益有矛盾，企业就能够逃避计算原则。行政当局作为反措施，就会增加各种细节的指令、限制和禁令。来自这种行政程序的并不是对市场的成功模拟，而是调节者和被行政机构所调节企业之间的经常冲突。

兰格模式的另一个缺点是忽视竞争问题。拉沃伊(Lavoie)(1985)正确地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古典讨论片面地把重点放在计算正确的价格信号上，而忽视了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关于“竞争”的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在一个名符其实的市场过程中，当事人都想使用并且能够使用他们的特殊知识和机会。他们彼此是竞争对手。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总是处在动态不均衡的状态。各种竞赛造成的总的潜力总是超过实际的需求。有些人胜利，有些人失败。胜利带来了报酬：生存、发展、更多的利润，更多的收入。失败带来了惩罚：失去利润，收入减少，在极端的场合下破产。使用本论文的术语，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的市场包含硬预算约束和买方市场。只要体制和政策不能保证这两个条件，就没有真正的市场。兰格模式的最大弱点是没有仔细考虑这些条件，许多兰格的追随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兰格所想像的是具有瓦尔拉斯反馈机制、能平衡供求的市场。但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中央控制系统固有的倾向是在第六章所描述的经济的不同领域内产生长期的过度需求。

7.2 天真的改革家

这是作者对一组曾经是改革先驱者的经济学家的称呼。在匈牙利，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乔治·彼得(György Péter)(1954aH, bH, 1956H, 1967)。其次是山道尔·巴拉西(Sándor Balázs)(1954H)、彼得·恩多斯(Peter Erdo's)(1956H)、托马斯·纳吉(Tamas Nagy)(1956H)和伊斯特万·瓦尔加(Istvan Varga)(1957H)。本文作者1955—1956年期间写第一本著作《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化》时，也可以被列入这类改革家的行列^①。波兰的布鲁斯[1961](1972)、苏联的利别尔曼(Evsey G. Liberman)[1962](1972)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1967)也属于这类改革家。这里只是随意地列举了很少数的人，用以说明天真改革家这一概念。这里提到的早期著作的作者，除了彼得和瓦尔加外都还健在，其中大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已改变了早期的理论观点。

这些经济学家彼此之间有不同意见。我们只将指出他们的一些共同点。这是更有意义的，因为正是这些共同点清楚地反映在匈牙利1968年改革的正式决议和文件中^②。特别重要的是，类似的思想也出现在今天中国的正式文件中。许多匈牙利经济学家经过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经验已经失去了这种天真。但是，由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同行们急切地希望改革起步，但缺少第一手的经验，所以今天同样显示了这种天真，甚至因匈牙利人的批判态度而感到激怒。

在进行批评以前，应该说一些赞扬的话。即使作者因其早期著作也被列入上述名单，但我们不能由于虚伪的谦虚而不去承认

① 这里可参考本书第2页注②中所列的名单。

② 最重要的文件可以从亨利克·法斯(Henrik Vass)编的文集(1968H)中找到。也可看涅尔什(Nyers)等人的著作(1969)。涅尔什1968年时是负责经济工作的党的书记，因而被认为是1968年改革蓝图的主要设计师。

这些先驱著作所表现的智力上和政治上的勇敢。这些著作的描述部分包含着深刻的、并且至今仍有价值的对改革前的体制的批判性分析。这些著作的建设性部分指出了匈牙利和中国以后实际改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改革尝试的方向：企业自治权、正确的价格信号、利润刺激、利用市场力量、过渡到买方市场等等。但是，先驱者没有预见到许多复杂情况。事实表明，这些情况已经成为妨碍贯彻他们建议的障碍。

天真的改革家没有认识到间接行政控制和市场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在废除了命令体制，从直接控制转到间接控制以后，就具备了市场顺利运行的充分条件。他们的思路可以概括如下：我们应该具有谋取利润最大化、几乎自治的企业。它将根据供求的变化对相对价格、利息率、税收、贷款额度的信号作出反应。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央调节和市场之间就没有矛盾。事实正好相反，市场只是中央决策者手中的“工具”。只要中央权力机构的官员抓住各种间接控制的绳子，谋取利润最大化的当事人就会顺从的木偶一样行动。匈牙利的经验已经说明，这种基本的假设是错误的。

这种假设的哲学基础是乐观地相信可以达到或至少接近完全的和谐。市场尽管是好的，但不能完全成为自发的。市场的不完善可以用中央干涉来纠正，因为中央可以比盲目的市场力量更好地了解社会利益。天真的改革家承认中央计划工作者不是不会犯错误的。于是计划的不完善可以依靠市场的帮助来消除，这样，可以自动地消除错误。相信“计划”和“市场”（用本文的语言来说，就是行政和市场）和谐一致、它们具有相互校正的双重功能，这是先驱者天真性的主要表现。

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的并存并不能保证我们得到“两个世界的最好部分”，这也并不是说不可避免地得到“两个世界的最坏部分”。这是极端的简单化。某种互相的校正是可能的。如果市场力量引起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或者引起了破坏

环境的外部因素等等，行政机构可以而且应该采取校正的措施（在这方面，匈牙利并没有采取充分的校正措施），如果政府的干预措施产生不良影响，市场的不均衡状态就会发出信号，计划者就应当根据这种信号进行调整。但是，不要对这种有益的互相补充指望太多，实际上，行政机构的干预愈多，这种干预就会削弱第一种干预的作用。每一条绳子似乎都可以控制企业，但是，企业被上百条绳子牵着，它就开始麻木了。它对行政机构的调节没有明确的反映，对市场信号也不反映。拉热劳·安塔尔（László Antal）（1979）很贴切地称之为“调节的幻想”。

天真的改革家在寻求划分行政机构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合理界限。许多人设想合理的界限是：“简单再生产”（马克思的用语）由市场调节，“扩大再生产”由计划者调节。换句话说，现行生产由市场调节，投资由计划者调节。事实上，这种划分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行政机关不准备把它的活动仅限于投资，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的成长和技术的发展同企业的利润和财务状况无关，而仅仅依靠上级行政部门的意志的话，那么企业自主权和利润刺激也变成了一句空话。

先驱的改革家想消除行政机构的一切成员的疑虑，告诉他们在改革后会有充分的活动余地。他们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运动，是控制者自觉地改变行为，而不是被控制者“自下而上”的运动。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存在着棘手的内在矛盾：即使改革是成功的，怎样才能使那些失去部分权力的人积极参加改革。在匈牙利，消除疑虑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官僚机构没有触动。经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很难一下子都改变（Kornai 1984）。毫不奇怪，在匈牙利，不是“计划”和“市场”的和谐并存，而是在 3.2 节中叙述的那种行政机构有决定影响的双重依赖体制。如前所述，一旦行政干预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点，市场将或多或少会失去活力。

天真的改革家关心国有企业的问题，但很少考虑对非国有部

门作用的重新认识问题。然而，事实表明，迄今为止，只有非国有部门对经济生活带来最明显的变化。

7.3 加尔布雷思社会主义

很难简单地对目前匈牙利的经济学派加以分类。从一定意义上说，每个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是改革的拥护者：改革是政治领导和政府正式宣布的政策。但是，真正重要的不是一般看法，而是对现有体制的具体评价和对未来体制的可行建议。在这些方面，观点是有差别的；围绕许许多多的问题的争论将继续进行。两个在第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经济学家，可能在第二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批评和建议。但是，为了使文章更易于理解，我将把本节和下节的内容描绘为两个“学派”。需要指出的是，我在分类时可能有些随意性，而那些确实属于这个或那个学派的人们则可以仍旧保留着他们个人的观点和疑义。我们无非是把两个具有某种不定形的现行思想加以典型化。

我们称第一个学派为“加尔布雷思社会主义”。这是本文作者所创造的名词。很可能这个学派的成员和加尔布雷思本人都不欢迎这个名词。然而，加尔布雷思的著作是这个学派著作(László Horváth 1976H, Ferenc Kozma 1983aH, bH, Tamás Sugár 1984H, Andrea Szegő 1983aH, bH)中最有特点的参考书。一场有时甚至相当激烈的争论在他们和“激进的改革者”学派之间进行着。而通过这场争论，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第一个学派的观点，后一个学派的观点将在下一节阐述。

加尔布雷思主义者明确地指出，激进派拥护的是一种具有时代错误的体制。他们说，激进派想使19世纪初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重现。这种机制是：市场不受政府干预，小企业占统治地位。激进派被指责为社会主义的弗利德曼主义者。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这涉及到了加尔

布雷思 (1967 a, b)和其他作者对现代私人市场经济的描述。当代资本主义是一种二元经济：一方面是少数权力集中的大公司，它们处于垄断和寡头地位，同政府结合在一起并受到政府的保护。这部分经济在一种由政府以庞大权力继续实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所造成的环境中运行。例如，实行价格和工资的调节、推行保护主义措施等等。另一部分经济由小生产者、小商人和家庭组成，它们的活动受市场支配。虽然经济中存在着两个部分，但前者具有强大力量并占据统治地位，后者则处于辅助和从属的地位。加尔布雷思学派认为，如果这种状况在现代资本主义是真实的，那么完全没有理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求更大程度的分散化。相反，社会主义体制有可能并有义务更彻底地实行集中计划和协调，建立中央计划机关和大企业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中央计划的决定性作用不必躲躲闪闪地隐藏着，而必须公开化和大胆地公布出来，当然，应该比以前组织得更好。那种大的垄断者、寡头以及同它们发生联系的国家必须变成“企业家”；“企业家身份”将不再是小企业的特权。

加尔布雷思学派的思想受到一些著作的批评，说这个学派希望回到改革前的命令经济中去。但是，就这个学派公开出版的著作来说，他们并没有提出要回到包罗万象的命令经济去。他们所提出的不过是说原先的状态具有合理性。他们证明，假若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行政与市场、大企业与小企业这些因素中第一种因素居于无可争辩的优势地位，那么现存体制中的两重性就可以和平共处。在一些著作中，他们指出，他们对市场或私有经济并没有信心，而宁愿看到它们的作用被削弱。他们希望保持现状，只进行一些小的改良，但是拒绝改变现状太多的激进改革。为此，该学派提出要利用当代资本主义的所有理论结论和实际经验：卡莱茨基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西方管理学院的教科书，从对工业化国家政府部门、大银行和大公司的实际考察中得出的教训。以上所列各点中的每一点经验都应受到欢迎。

“你看，现在的体制在许多方面与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当然，这种说法是对匈牙利的现状的古怪的“意识形态”的支持。问题是夸大了两者相似的部分。诚然，现代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于原子化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世界。即便是那样，在今天匈牙利的经济机制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间仍然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别。我们只列举同本文有关的一些特点。

虽然两种体制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中，都存在着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但是比重相差悬殊。在匈牙利，国有企业占统治地位；而在西方，国有部门虽然重要但却比重很小。

两种体制都存在许多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但它们的规模分布又很不同。如表3所示，匈牙利的集中程度远远高于西方。

“软预算约束”在两种体制下都会出现。在匈牙利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同样的现象在西方几乎是例外。与此有关的是对价格的反映，匈牙利国有企业的反应相当迟钝，在西方的经济生活中，包括大公司在内对价格的反应非常灵敏。

两种体制同样都存在着政府的行政干预。在匈牙利，这种行政干预贯穿于整个经济过程，事无巨细的行政干预使得国有企业高度依附于政府；在西方，虽然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并非微不足道，但是经常性的强烈的行政干预则很少。而且就程度来说，并没有超出使市场活力削弱的临界点。

短缺和过剩在两种体制中都同样存在。在匈牙利，短缺相当普遍，有利于买方的卖方激烈竞争只是一种例外。而在西方，恰恰相反。短缺也偶尔出现，但典型的状况是竞争者为吸引买者展开的激烈角逐。不仅小企业是如此，而且那些大公司也是如此。它们都同样感到，在同一部门或不同部门的企业中，新的企业和新的产品或多或少地把一种实际的威胁和潜在的竞争带到了市场上来，当然同外国企业的竞争也是如此。

然而，争论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加尔布雷思”学派的追随者们的思想应该受到充分的注意，因为他们在同其他学派，尤其是

激进的改革者的争论中指出了他们的一些弱点。

7.4 激进改革者

这不是一个有着可共同接受的改革纲领的集团。我们这里所指的是一些在不同的研究机构工作或在一些高级政府机关任职，并或多或少持有相同改革思想的经济学家。虽然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是涅尔斯(Nyers)和塔多斯(Tardos)(1978, 1979, 1984)、鲍尔(Bauer)(1984, 1985 a), 塔多斯(1986), 安斯洛(Antal)(1985 aH, 1985 b), 但是有同样精神的文章不可胜数^①。

激进的改革者们对目前的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分析。本文主要使用了这些研究材料。这里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提出的规范的建议。除了一些细节外，他们已描绘出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他们提出的许多慎重的建议也远胜过二三十年前天真的改革家。其主要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

需要建立一种市场出清的价格制度，而且只有这种定价原则是可以接受的。要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只有例外的场合才会允许违背这些原则。必须强化利润刺激，以使企业对价格信号有敏感的反应。除外，还要实行新的刺激结构，激励企业把不断增加净产值作为主要目标^②。

应当校正规模分布的歪曲。较好的办法是用各种政策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支持新的企业自由进入，解散高度垄断、过度

① 激进改革的先驱者是梯勃·里斯卡(Tibor Liska 1963H, 1969H), 后来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建立在出租国有资本给个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蓝图。他的观点明显地区别于以上所列的其他激进改革者的建议。本文的容量不允许我去评论他的建议和他们的批评。里斯卡的计划在J·巴索诺(Jenő Ba' rsony)(1982)、诺曼·曼卡尔(Norman Macrae)(1983)和伊斯特万·西克拉基(Istvá n Siklaky)(1985H)著作里中做了讨论。

② 这是一种合理的最大化。遗憾的是，在前一节中对人为“规则”和向具有内在动力的活生生的组织施加“刺激计划”的可行性提出的怀疑，同样适应于这种建议。

集中和过于庞大的企业。只有在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并能够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成功地活动时，大企业才是需要的。

必须消除竞争的障碍。应当推动各种不同形式的竞争：不同社会部门之间的竞争；大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等等。

为实现这种目标不断进行的体制改革要与适当的宏观政策相结合，应最大限度地扩大买方市场的范围。

必须清除阻碍建立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障碍。相对于经济的其他部门而言，在获得劳动力方面，国营部门不能处于不利的地位。工资的确定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严格的财务纪律和硬化预算约束必须得到保证。这种努力还必须与更大程度的资金分配权力的分散化和灵活的资本市场的建立相结合。破产的可能性应成为一种最终的威胁。与此同时，那些盈利的企业必须获得利用自有资本、贷款或在资金市场筹集资金等方式迅速扩张的机会。这些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政府预算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必须减少。

商业银行系统必须获得充分的发展，并根据商业原则进行活动。

在进出口活动中，必须允许更大规模的竞争。必须让实际的汇率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创造进口自由化和外汇全部自由兑换的条件。

需要保护私人经营的法律，明确私人活动的合法范围和界限。

必须创造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条件，各种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集团必须有自己适当的政治代表。国家必须在经济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它的主要任务是对需求进行宏观管理，限制垄断、发展基础设施，保护社会安全、反对外来侵略，进行个人收入的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

上述变化或许一些更重要的措施必须“一揽子”行动，孤立

地完成一种改革而没有其它必须的改革所创造的适当条件相配合，都是具有风险、或者是有害的。

本文作者认为，实现这些建议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仍有相当多的实质性问题未解决。例如，所有制和产权的问题在激进改革者的著作中就没有清晰详尽的阐述。这个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第一，非国有制的前景如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蓝图中私有制的未来怎样？它们的比重可以不断地扩大吗？在社会主义国家，拥有7个雇工的小企业是可接受的上限吗？

第二，国家所有制的传统形式能够同以上建议的改革措施，包括强化利润动机、自由进入市场、硬化预算约束、灵活的工资决定、有效的资本市场没有矛盾吗^①？许多作者提出了把企业经营从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分离出来的各种方案。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实行工人自治，因为这可以确保企业摆脱行政干预而保持独立性。（Bauer 1984, István Csillag 1983 H）^②。反对者认为，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历史和工人参加选拔和任命经理的最初的经验证明，它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另外一些人例如塔多斯（1982）则建议经理应当同被宣布为“所有者利益”代表的机构相分离。象资本主义合股公司的董事会一样，由后者来任命和监督经理。但是批评者们怀疑：这种被委任（由谁委任？由行政机关吗？）作为“所有者”代表社会的人为产生的团体能模拟所有者的利益吗？

本文前几节提出的许多论点非常发人深思。在匈牙利现有的政治结构条件下，国有企业真正的自主权可以得到保证吗？同样，行政部门自觉地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而不超出以上概括的建议所划定的界限吗？

这又引出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

① 这是那些对这些改革建议持反对意见的人反复提出的理由（见Szegő 1983 bH）。

② 托马斯·萨考齐（Tamás Sárközy）（1982）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能够大大超越匈牙利已经完成的那些部分而继续前进吗？或者说，目前匈牙利的改革已或多或少显示出的改革的最终界限了吗？体制上的其它一些次要方面的改革，不论它们如何必需，并没有触及这个问题的实质。

作者必须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矛盾心理。作为一个匈牙利公民，他真诚地希望以上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将获得积极的答案。作为一个顾问，他努力帮助改革的过程顺着以上列举的方向前进。而作为一个研究者，他保留着怀疑的权力。

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中能够有把握地吸取的一个教训是，更深刻全面的体制改革有更大程度的不可预见性。回答以上提出的问题，不能依靠推测，而只能依靠历史的经验。到目前为止，匈牙利并没有提供一种结论性的答案。我们必须等待并观察匈牙利、南斯拉夫、中国的经验，或者其他可能走改革之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可能揭示的东西。

参 考 文 献

这里列出的参考文献不包括匈文的著述。文中所引的匈文著作作用字母“H”加以区别(参见本书第7页脚注^①)。希望获得匈文参考书目的读者可以向美《经济学文献》杂志或本文作者索取。

- ANTAL, LÁSZLÓ. "Development—with Some Digression. 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in the Seventies," *Acta Oecon.*, 1979, 23(3-4) pp. 257-73.
- "About the Property Incentive," *Acta Oecon.*, 1985b, 34(3-4), pp. 275-86.
- BALASSA, BÉLA. *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in economic planning*. New Haven: Yale U. Press, 1959.
- "The Economic Reform in Hungary. Ten Years After," *Eur. op. Econ. Rev.*, Oct. 1978, 11(3), pp. 245-68.
- "Reforming the New Economic Mechanism in Hungary," *J. Compar. Econ.*, Sept. 1983, 7(3), pp. 253-76.
- BALASSA, BÉLA AND TYSON, LAURA. "Adjustment to External Shocks in Socialist and Private Market Economics." Mimeo.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Department, 1983.
- BARONE, ENRICO. "The Ministry of in the Production Collectivist State,"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Ed.: FRIEDRICH A. HAYEK.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08] 1935, pp. 245-90.
- BÁRSONY, JENŐ. "Tibor Liska's Concept of Socialist Entrepreneurship," *Acta Oecon.*, 1982, 28(3-4), pp. 422-55.
- BAUER, TAMÁS. "The Contradictory Position of the Enterprise Under the New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Eastern Europ. Econ.*, Fall 1976, 15(1), pp. 3-23.

- . "Investment Cycles in Planned Economics." *Acta Oecon.*, 1978, 21(3), pp. 243-60.
- . "The Second Economic Reform and Ownership Relations: Some Considera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conomic Mechanism," *Eastern Europ. Econ.*, Spring/Summer 1984, 22(3-4), pp. 33-87.
- . "Reform Policy in the Complexity of Economic Policy," *Acta Oecon.*, 1985a, 34(3-4), pp. 263-74.
- . "The Unclearing Market." Mimeo. Budapest: Institute of Economics, 1985b.
- BERGSON, ABRAM. "Socialist Economics, in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Ed.: HOWARD S. ELLIS. Homewood, IL: Irwin, 1948, pp. 1412-48.
- . "Market Socialism Revisited," *J. Polit. Econ.*, Oct. 1967, 75 (5), pp. 655-73.
- BERLINER, JOSEPH S.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Cambridge, MA: Harvard U. Press, 1957.
- BOGNAR, JÓSEF. "Further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Reform," *The New Hungarian Quart.*, Autumn 1984, 25(95), pp. 45-54.
- BORNSTEIN, MORRIS. ed. *The Soviet economy: Continuity and change*. Boulder, CO, &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1.
- BRUS, WLÓDZIMIERZ.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1961] 1972.
- CHIKÁN, ATTILA. "Market Disequilibrium and the Volume of Stocks," in *Th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inventories*. Ed.: ATTILA CHIKÁN. Amsterdam: Elsevier, 1981, pp. 73-85.
- CSAKI, CSABA.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of Hungarian Agriculture," *J. Compar. Econ.*, Sept. 1983, 7(3), pp. 317-28.
- DÁNIEL, ZSUZSA. "The Effect of Housing Allocation on Social Inequality in Hungary," *J. Compar. Econ.*, Dec. 1985, 9 (4), pp. 391-409.
- DONÁTH, FERENC. *Reform and revolution: Transformation of Hu-*

- ngary's agriculture 1945-1975*. Budapest: Corvina, 1980.
- EHRlich, EVA. "The Size Structure of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and Enterprise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 Compar Econ.*, 1985a, 9(3), pp. 267-95.
- FÁBRI, ERVIN. "Superficial Changes and Deep Tendencies in Inventory Process in Hungary," *Acta Oecon.*, 1982, 28(1-2), pp. 133-46.
- FALUS-SZIKRA, KATALIN. "Wage and Incom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Economies in Hungary," *Acta Oecon.*, 1986, 36(1-2), forthcoming.
- FAZEKAS, KÁROLY AND KÖLLÖ, JÁNOS. "Fluctuations of Labour Shortag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after 1968," in PÉTER GALASI AND GYÖRGY SZIRÁ CZKY, 1985, pp. 42-69.
- FEHER, FERENC; HELLER, ÁGNES AND MÁRKUS, GYÖRGY.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Oxford: Blackwell, 1983a.
- GÁBOR, R. ISTVÁN. "The Second (Secondary) Economy. Earning Activity and Regrouping of Income Outside the Socially Organized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cta Oecon.*, 1979, 22(3-4), pp. 291-311.
- . "The Major Domains of the Second Economy," in PÉTER GALASI AND GYÖRGY SZIRÁ CZKY, 1985, pp. 133-78.
- GÁCS, JÁNOS. "Passive Purchasing Behaviour and Possibilities of Adjustment in the Hungarian Industry," *Acta Oecon.*, 1982, 28(3-4), pp. 337-49.
- GALASI, PÉTER AND SZIRÁ CZKY, GYÖRGY, eds. *Labour market and second economy in Hungary*. Frankfurt & NY: Campus, 1985a.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67a.
- . *American capital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1967b.
- GOMULKA, STANISLAW. "Kornai's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nd the Shortage Phenomenon: A Criticism and Restatement," *Econ.*

Planning, 1985, 19(1), pp. 1—11.

GRANICK, DAVID. *Management of the industrial firm in the US-SR*. NY: Columbia U. Press, 1954.

———. "Central Physical Planning, Incentives and Job Rights,"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Present views*. Ed.: ANDREW ZIMBALIST. Boston, The Hague: Kluwer-Nijhoff, 1984.

GREGORY, PAUL R. AND STUART, ROBERT C.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80.

———. *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NY: Harper and Row, 1981.

GROSSMAN, GREGORY. "Gold and the Sword: Money in the Soviet Command Economy," in *Industrialization in two systems*. Ed.: HENRY ROSOVSKY. NY.: John Wiley, 1966, pp. 204—36.

———. "The '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 *Problems of Communism*, 1977, 26(5), pp. 25—40.

———.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A Bibliography." Mimeo. Berkeley & Durham: U. of California and Duke U., 1985.

HALPERN, LÁSZLÓ AND MOLNÁR, GYÖRGY. "Income Formation Accumulation and Price Trends in Hungary in the 1970s," *Acta Oecon.*, 1985, 35(1—2), pp. 105—31.

HARE, PAUL; RADICE, HUGO K. AND SWAIN, NIGEL, eds. *Hungary: A decade of economic reform*. London & Boston: Allen & Unwin, 1981.

HAYEK, FRIEDRICH A.,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5.

HEWETT, EDWARD A. "Lessons of the 1970's and Prospects for the 1980's," in *East European economic assesment. Part I, country studies*.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U. 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U.S. GPO, 1981.

HOLZMAN, FRANKLYN D. "Soviet Inflationary Pressures 1928—

- 1957: Causes and Cures," *Quart. J. Econ.*, May 1960, 74, (2), pp. 167-88.
- HUNTER, HOLLAND. "Optimal Tautness in Developmental Planning," *Econ. Develop. Cult. Change*, July 1961, 6 (2), pp. 561-72.
- INTERNATIONAL CURRENCY REVIEW, May 1981, 13(2), p. 31.
- KAPITANY, ZSUZSA; KORNAI, JÁNOS and SZABÓ, JUDIT. "Reproduction of Shortage on the Hungarian Car Market," *Soviet Stud.*, 1984, 36(2), pp. 236-56.
- KEREN, MICHAEL. "On the Tautness of Plans," *Rev. Econ. Stud.*, Oct. 1972, 39(4), 469-86.
- KEREN, MICHAEL; MILLER, JEFFREY AND THORNTON, JAMES R. "The Ratchet: A Dynamic Managerial Incentive Model of the Soviet Enterprise," *J. Compar. Econ.*, Dec. 1983, 7(4), pp. 347-67.
- KONRÁD, GYÖRGY AND SZELÉNYI, IVÁN.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 KORNAI, JÁNOS.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London: Oxford U. Press, [1957] 1959.
- . "Resource-Constrained Versus Demand-Constrained Systems," *Econometrica*, July 1979, 47(4), pp. 801-19.
- .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0.
- . *Growth, shortage and efficiency*. Oxford: Blackwell, 1982.
- . "Bureaucratic and Market Coordination," *Osteuropa Wirtschaft*, Dec. 1984, 29(4), pp. 306-19.
- . "On the Explanatory Theory of Shortage. Comments on Two Articles by K. A. Soós," *Acta Oecon.*, 1985a, 34(1-2), pp. 145-64.
- . "Gomulka o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 Reply," *Econ. Planning*, 1985b, 19(2), pp. 49-55.
- .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1986, 39(1), pp. 3-30.
- KORNAI, JÁNOS AND MATITS, ÁGNES. "Softness of the Budget

- Constraint—An Analysis Relying on Data of Firms,” *Acta Oecon.*, 1984, 32(3-4), pp.223-49.
- KÖVES, ANDRÁS AND OBLÁTH, GÁBOR. “Hungarian Foreign Trade in the 1970s,” *Acta Oecon.*, 1983, 30(1), pp.89-109.
- KOWALIK, TADEUSZ.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by Written Alec Nove 1983,”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Mar. 1984, 3(1) pp. 91-97.
- LACKÓ, MARIA. “Cumulating and Easing of Tensions,” *Acta Oecon.*, 1980, 24(3-4), pp. 357-77.
- . “Behavioral Rul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ectoral Investments in Hungary, 1951-1980,” *J. Compar. Econ.* Sept. 1984, 8(3), pp. 290-300.
- LAKI, MIHÁLY. “Liquidation and Merger in the Hungarian Industry,” *Acta Oecon.*, 1982, 28(1-2) pp. 87-108.
- . “The Enterprise Crisis,” *Acta Oecon.*, 1984, 32(1-2), pp. 113-24.
- LAKY, TEREZ. “The Hidden Mechanism of Recentralization in Hungary,” *Acta Oecon.*, 1980, 24(1-2), pp. 95-109.
- . “Enterprise Business Work Partnership and Enterprise Interest,” *Acta Oecon.*, 1985, 34(1-2), pp. 27-49.
- LANGE, OSCA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v. Econ. Stud.*, Oct. 1936 & Feb. 1937, 4(1-2), pp. 53-71, 123-42.
- LAVOIE, DON.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Cambridge U. Press, 1985.
- LEVINE, HERBERT S. “Pressure and Planning in the Soviet Economy,” in *Industrialization in two systems.* Ed.: HENRY ROSSOVSKY. NY: John Wiley, 1966, pp. 266-85.
- LIBERMAN, EVSEY G. “The Plan, Profits and Bonuses,” in *Socialist economics: Selected readings.* Eds.: ALEC NOVE AND D. M. NUTI. Middlesex: Penquin Books, [1962] 1972, pp. 309-18.
- LINDBLOM, CHARLES.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

- cal economic systems*. NY: Basic Books, 1977.
- MACRAE, NORMAN. "Into Entrepreneurial Socialism," *The Economist*, 19—25. Mar. 1983, 286 (7281), pp. 23—29.
- MARER, PAUL. "The Mechanism and Performance of Hungary's Foreign Trade, 1968—79," in P. HARE ET AL., 1981, pp. 161—204.
- . *East-West technology transfer. Study of Hungary 1968—1984*. Paris: OECD, 1986a.
- . "Economic Reform in Hungary: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 Regulated Market," *East-European economics: Slow growth in the 1980's. Country studies on Eastern Europe and Yugoslavia*, Vol. 3,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 S. GPO, 1986b.
- MARRESE, MICHAEL.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Hungary," *J. Compar. Econ.*, Sept. 1983, 7 (3), pp. 329—45.
- MISES, LUDWIG VON.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Ed.: FRIEDRICH A. HAYEK.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5, pp. 87—130.
- MONTIAS, JOHN M.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system*. London & New Haven, CT: Yale U. Press, 1976.
- NEUBERGER, EGON AND DUFFY, WILLIAM.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A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Boston & London: Allyn & Bacon, 1976.
- NOVE, ALEC.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a.
- .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b.
- NUTI, DOMENICO MARIO. "Hidden and Repressed Inflation in Soviet-Type Economics: Definitions, Measurement and Stabilisation," *EUI Working Paper*, No. 85/200, 1985, Oct.
- NYERS, REZSŐ; BAGOTA, BÉLA AND GARAM, JÓZSEF. *Economic reform in Hungary. Twenty-five questions and twenty-five*

- answers. *An interview with Rezső Nyers*. Budapest: Pannónia, 1969.
- NYERS, REZSŐ AND TARDOS, MÁRTON. "Enterprises in Hungary Before and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 *Acta Oecon.*, 1978, 20 (1-2), pp. 21-44.
- . "W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Should we Adopt?" *Acta Oecon.*, 1979, 22 (1-2), pp. 11-31.
- . "The Necessity for Consolid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ment in Hungary," *Acta Oecon.*, 1984, 32 (1-2), pp. 1-19.
- PÉTER, GYÖRGY. "On the Planned Central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the Economy," *Acta Oecon.*, 1967, 2 (1-2), pp. 23-45.
- POLÁ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Y: Farrar & Rinehart, 1944.
- PORTES, RICHARD. "Economic Reforms in Hungary," *Amer. Econ. Rev.*, May 1970, 60 (2), pp. 307-13.
- . "The Tactics and Strategy of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Soviet Stud.*, Apr. 1972, 23 (4), pp. 629-58.
- . "Hungary: Economic Performance, Policy and Prospects," in *East European economics post-Helsinki*.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GPO, 1977.
- .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Macroeconomic Disequilibrium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Econometrica*, forthcoming.
- PORTES, RICHARD; QUANDT, RICHARD; WINTER, DAVID AND YEO, S. "Macro-economic planning and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Poland."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No. 91, 1986.
- PORTES, RICHARD AND WINTER, DAVID. "The Supply of Consumption Good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J. Compar*

- Econ.*, Dec. 1977, 1(4), pp. 351–65.
- . “The Demand for Money and for Consumption Good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Rev. Econ. Statist.* Feb. 1978, 60 (1), pp. 8–18.
- .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Consumption Goods Market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Rev. Econ. Stud.*, Jan. 1980, 47 (1), pp. 137–59.
- QUARTERLY REVIEW, Budapest. 1985, 3(3), p. 33.
- RÉVÉSZ, GÁBOR. “Enterprise and Plant Size: Structure of the Hungarian Economy,” *Acta Oecon.*, 1979, 22 (1–2), pp. 47–68.
- ROMÁN, ZOLTÁN. “The Conditions of Market Competition in Hungarian Industry,” *Acta Oecon.*,
- SÁRKÖZY, TAMÁS. “Problems of Social Ownership and of the Proprietary Organization,” *Acta Oecon.*, 1982, 29 (3–4), pp. 225–58.
- SIK, OTA. “Socialist Market Relations and Planning,” in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Essays presented to Maurice Dobbs*. Ed.: C. H., FEINSTEIN. Cambridge: Cambridge U. Press, 1967, pp. 133–57.
- SIPÓS, ALADÁR. “Relations Between Enterprises in the Agro-Industrial Sphere in Hungary,” *Acta Oecon.*, 1983, 31 (1–2), pp. 53–69.
- SOÓS, KÁROLY ATTILA. “Causes of Investment Fluctuations in the Hungarian Economy,” *Eastern Europ. Econ.*, Winter 1975–76, 14 (2), pp. 25–36.
- . “À Propos the Explanation of Shortage Phenomena: Volume of Demand and Structural Inelasticity,” *Acta Oecon.*, 1984, 33 (3–4), pp. 305–20.
- STARK, DAVID. “The Micropolitics of the Firm and the Macropolitics of Reform: New Forms of Workplace Bargaining in Hungarian Enterprises,” in *State versus markets in the world-system*. Eds.: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 EVELYNE HUMBER STERHENS.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5, pp. 247-69.
- SWAIN, NIGEL., "The Evolution of Hungary's Agricultural System Since 1967," in P. HARE ET AL., 1981, pp. 225-51.
- SZABÓ, JUDIT AND TARAFÁS, IMRE. "Hungary's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the 1980's," *Acta Oecon.*, 1985, 35 (1-2), pp. 53-79.
- SZALAI, ERZSÉBET. "The New Stage of the Reform Process in Hungary and the Large Enterprises," *Acta Oecon.*, 1982, 29(1-2), pp. 25-46.
- SZAMUELY, LÁSZLÓ. "The First Wave of the Mechanism Debate in Hungary 1954-57," *Acta Oecon.*, 1982, 29 (1-2), pp. 1-24.
- . "The Second Wave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Debate and the 1968 Reform in Hungary," *Acta Oecon.*, 1984, 33 (1-2), pp. 43-67.
- SZELÉNYI, IVÁN. *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 Press, 1983.
- TARDOS, MÁRTON. "The Role of Money: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Enterprises in Hungary," *Acta Oecon.*, 1980, 25 (1-2), pp. 19-35.
- . "Developing Program for Economic Control and Organization in Hungary," *Acta Oecon.*, 1982, 28 (3-4), pp. 295-315.
- . "The Conditions of Developing a Regulated Market," *Acta Oecon.*, 1986, 36 (1-2), forthcoming.
- TAYLOR, FRED M.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Amer. Econ. Rev.*, Mar 1929, 19 (1), pp. 1-80. Reprinted in Ed.: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BENJAMIN E. LIPPINCOTT. NY: McGraw-Hill, [1938] 1964.
-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 1969*. NY, 1970.
- . *Statistical Yearbook 1978*. NY, 1979.
- .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1*. NY, 1983a.

———.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Jan. 1983b, (37) 1.

———.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2*, NY. 1985a.

———.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Oct. 1985b, (39) 10.

WEBER, MAX.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xford: Oxford U. Press, [1922] 1947.

WILLIAMSON, OLIVER.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Y: The Free Press, 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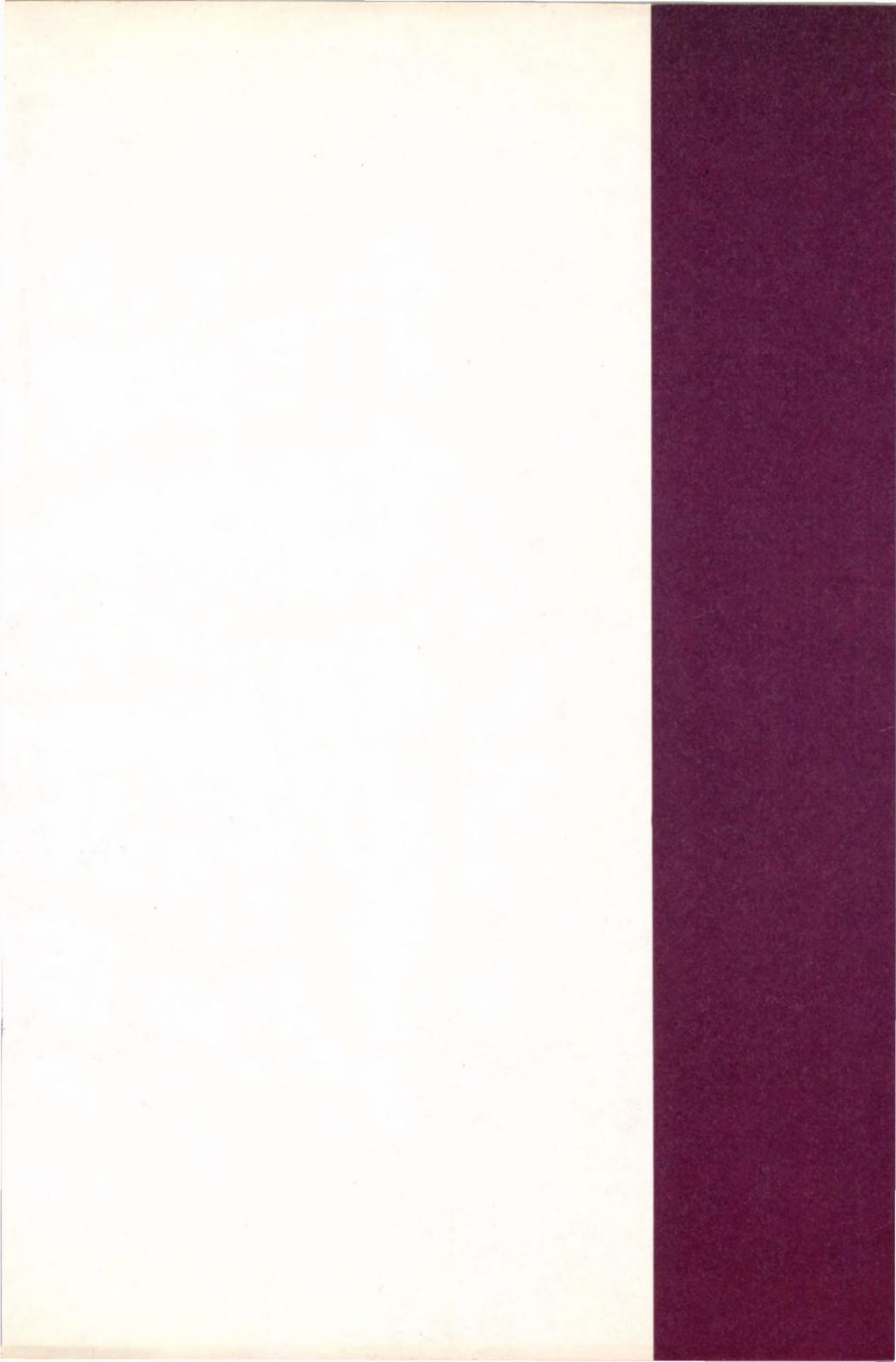
-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Jan. 1933. 371
- Statistical Yearbook 1931, NY 1932
-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Oct. 1933. 387-10
- WEBER, MAX.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xford: Oxford U. Press (1929) 1947.
- WILLIAMSON, OLIVER. Workers and harvests. English and
contemporary statistics. NY: The Free Press, 1975.

Faint,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Lixiang yu xianshi - xiongyiali
de gaige guocheng.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Beijing: Zhongguo jingji
Chubanshe, 1988.



责任编辑：袁放尧

封面设计：徐 沉

ISBN 7-5017-0041-9/F·135

统一书号：4395·135 定价：1.00元